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中国近代爱国名人 3



中国近代爱国名人

留芳千古 永垂不朽 ——喻培伦

在广州东北部，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大型墓碑，安息在那里的就是 80 年前黄花岗起义中殉难的七十二烈士。他们为推翻黑暗腐朽的清王朝，拯救危难之中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英勇壮举，催人泪下，感人肺腑；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愧是革命的先驱，他们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篇章。大型墓碑七十二烈士的名字中，被列为墓碑之首的是为争取祖国的光明前途而英勇献身的民主革命者、炸弹大王喻培伦烈士。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1886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敏捷过人。6 岁入私塾，塾师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历史上的屈原、岳飞、文天祥、洪秀全等爱国人物，是他崇拜的偶像，喻培伦从小立志为当一个爱国英雄而奋斗。

1900 年，喻培伦年满 15 岁时，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及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夭折了，但义和团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却在喻培伦的故乡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八国联军的大肆入侵，卖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受到如此耻辱，有热血、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都感到似刀绞一样疼痛。这一切不能不给少年时代的喻培伦以极大的震动。他当时曾刻一枚印章，自署“世界恶少年”，表示对这个世界的的不满，他厌恶封建的科举制度，喜欢机械、金石、雕刻和书画一类的技术。

20 世纪初的清王朝统治越发没落腐朽，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任人宰割，满目疮痍。怎样才使中国富强，走上光明之路，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喻培伦在苦苦地探求着。

1905 年，喻培伦兄弟俩怀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远渡重洋，留学日本。当时发生这样一件事，使他永生难忘。船到汉口，兄弟俩上岸游览，不知不觉闯入英租界。一个印度巡捕气势汹汹的拦住他，不准前进，喻培伦气愤地质问：“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什么不许中国人游玩？”蛮横的印度巡捕举手就打，由于喻培伦生来瘦弱，被印度人推下江堤，差点滚入长江。他第一次感到半殖民地人民的屈辱，悲痛万分。后来，回忆起此事，他说：“这比挖我的祖坟还伤心。”

喻培伦年底到达东京，先考入警察学校，第二年又考入经纬学校，1907 年又改入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学习理科。他一次又一次的转学，恨不得把日本的一切先进技术统统搬到中国去，来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现状，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他废寝忘食地学习物理、化学、工业分析、外语等课程，空余时间他就到大阪、神户、东京、横滨等地的日本工厂进行考察，设计许多办厂方案，想借此振兴实业，抵御外侮。由于当时清政府的黑暗腐朽，他的“实业救国”的愿望竟化为泡影。

1907 年，弟弟喻培棣告诉哥哥，自己加入了同盟会。正在为“实业救国”未能达到愿望而心灰意懒的喻培伦，了解到同盟会的纲领，心中豁然开朗，对救国前途充满希望，懂得了只有革命，推翻黑暗统治，才能扫清办实业的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夙愿，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1908 年夏，喻培伦在东京经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决心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为了革命斗争需要，他转行考入干叶医学校药科，潜心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在一次试验中，

不慎引起爆炸，警察闻声赶来，他急中生智，从容向警察出示医校学生证明，以作化学试验为托词遮掩过去。喻培伦的手脸被炸伤，医治后左手残废，然而他没有丝毫退缩，继续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一种安全而又威力强大的炸弹。从此同志们都称他是“炸弹大王”，称他的炸弹制法为“喻氏法”。

1908年前后，同盟会组织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一部分血气方刚的青年醉心于个人恐怖活动，主张谋刺清朝官吏，进行报复，以振革命党人士气。喻培伦赞同并积极参加。

1909年夏，革命党得到消息，两江总督端方调任北洋大臣，估计会从汉口经过，准备在端方北上途中把他杀掉。喻培伦在革命党人的协助下，选定汉口北面刘家庙车站，埋好烈性炸弹，但是狡猾的端方却偷偷从上海乘轮船走海路北上，谋杀端方，未能如愿。

同年秋，同盟会又决定暗杀摄政王载沣。他们在载沣必经的路上埋上一颗大炸弹，不料被发现，清吏请美日专家鉴定，美国人见这枚炸弹爆炸威力之大，设计之高明，均达世界先进水平，断定不是中国人制造。日本人根据炸弹外壳有明显的车削痕迹，肯定又是附近加工的。于是清吏按这一线索进行搜捕，黄复生被捕，喻培伦预先去了日本，才幸免此祸。

谋杀摄政王的失败，并没有使喻培伦气馁。他从日本赴香港，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在九龙城设立了暗杀机关，一面设法营救黄复生等革命党人出狱，一方面继续进行暗杀活动。

1911年春，同盟会要在广东发动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黄兴召喻培伦前往，专门负责供应炸弹。在广州甘家巷一处秘密机关，喻培伦不顾身体弱，和同志们一道，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共赶制出1000多颗炸弹。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统筹部决定在4月23日发动起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起义一再改期，后又定于4月27日。起义前一天，由于清军戒备加强，形势非常紧张，指挥起义的领导人黄兴想推迟日期，喻培伦坚决主张按期起义，他说：“举义诚知必死。然死国，义也。吾人不肯死，谁肯死者？国事将不可挽矣！”在喻培伦的劝说下，黄兴同意了4月27日起义。

起义前，大家考虑到他是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科学工作者，再加左手已废，行动不便，让他留下来。他回答：“学固不能磨灭，非我死可以亡之。如果临阵退怯，人格何在？”

1911年4月27日下午，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队伍冲向两广总督衙署，铁骨铮铮的喻培伦臂缠白巾，胸前挂着一筐炸弹，奔在最前边投掷，成为开路先锋。他首先炸开了总督衙门的后墙，爆炸有浓烟还没有散去，他已抢先冲进去。后来他又率领队伍准备攻打观音山的督练公所，走到莲塘街与清兵相遇。喻培伦一马当先登上房顶，居高临下，向清军投掷炸弹，炸得清军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纷纷后退。喻培伦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众先驱，殊死拼搏，从傍晚到深夜，表现出了无比顽强的英雄气概。这时清军大批援兵赶来，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力竭，喻培伦身受重伤而被清军所俘。

受审时，清军还不知道这位身残志坚的英雄是谁。喻培伦为避免连累同志，隐匿真实姓名，自称王光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他却大讲制造炸弹的情况和革命道理。在敌人面前，他坚贞不屈，誓死如归，慷慨激昂地说：“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党人的高尚气节。

壮烈就义时，年仅 25 岁。

1912 年 2 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并指令在他的家乡内江修建“喻大将军祠”，供后人悼念瞻仰。当年曾和喻培伦一起战斗的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书中高度赞扬喻培伦“不愧是留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蔡锷

在中国近代史册里，记载着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爱国主义者、护国将领的名字，这位护国英雄就是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蔡锷。他在领导云南的反清武装起义和发起、领导反袁护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及杰出的才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少年神童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波，1882年生于湖南邵阳的亲睦乡。父亲蔡政、母亲及兄妹，皆以农为业，家境简陋清贫。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兼以裁缝为业，经常到邵阳之西的武冈、洞口一带为人缝纫，后全家迁居武冈县西之三门王家板桥。蔡锷自幼聪颖，富于幻想。他6岁进私塾，10岁读完了“四书”“五经”，能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因而有“神童”之称。在湘西，还流传着蔡锷童年时期勤奋好学的佳话。他白天帮助家人到田野耕作，晚上独自点上油灯，常常读书到深夜。他怕家里人担心他的健康，便瞒着父亲，在灯碟里盛满油，深夜诵读，油尽始睡。蔡锷家贫，购书困难，他听到哪家亲友有藏书，虽在数十里之外，也要翻山越岭去借。他读书喜欢亲手抄录，笔记精华，成诵在心，因而理解较深，能融会贯通。然而，家境的贫困，使蔡锷在12岁时不得不终止读书。同乡名士樊锥爱其才，免费将蔡锷收为弟子。樊锥是清末湖南的著名维新志士，对蔡锷童年的思想影响很大。因而蔡锷的学业进步很快。13岁时应院试，因为生得瘦小，由父亲扛在肩上挤进考场。督学江标很赏识他的文章，补为县学生（秀才）。蔡锷14岁时又应岁试，名列一等。15岁跟随樊锥参加乡试，考入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新式学堂——长沙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在维新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变法活动的急先锋谭嗣同任学堂学监，崭露头角的梁启超任总教习。在时务学堂，蔡锷受变法思想的影响很深，也为梁启超大力鼓吹维新理论所感动。蔡锷“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在这里，他与梁启超结下师生、同志之谊。

1898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因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失败，谭嗣同等6人殉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被强令解散。变法的失败，梁启超、谭嗣同两位教师的一逃一死，给少年蔡锷的刺激很大。这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考送出国留学，应试者5000余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也因变法失败而不能成行。后他去武昌两湖书院求学，又因其是时务学堂旧生而被拒绝。1899年夏，蔡锷考入南洋公学，其时正值暑假，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幸遇在南洋公学任教的原长沙时务学堂教习李逸群，特许蔡锷先住宿学校。7月，蔡锷在上海等待入南洋公学时，梁启超自日本来函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遂东渡日本求学。

投笔从戎

蔡锷到日本后不久，进入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并实习普通学科。在这里学习期间，他以孟博、奋翮生的笔名，投稿于梁启超

办的《清议报》；稍后，考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后又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秋，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准备在汉口发动武装起义，蔡锷与11名同学随唐才常回国参加。后事机泄漏，唐才常等师友多数被杀。唐才常以为蔡锷年幼，不能担负重任，起义前半个月，派他联络革命同志黄泽生。黄泽生以为此次起义不易成功，料事必败，有志青年同时牺牲为可惜，便把蔡锷留在自己家中，不让赴难，蔡锷才得幸免。经此次事变，蔡锷改“良寅”为“锷”，表示自己投笔从戎的决心。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蔡锷重返日本横滨，与戡翼埕、王亮畴、沈虬斋、杨圃堂等创办《国民报》，宣传民族主义。同年，以私费入陆军成城学校，学费以译著自给。这时，梁启超在横滨出版《新民从报》，蔡锷以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积极写稿，其中《军国民篇》就是刊登于《新民从报》上的重要著作。

《军国民篇》是蔡锷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章首先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贫弱到了极点，如果再不以坚强尚武的精神唤起国民，中华民族就要真的灭亡了。《军国民篇》还分析了我国缺乏军国民主义的8条原因，论述了军国民的要素，强调要给国民以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等，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军国民篇》中蔡锷还抽象地提出了“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冶国魂”的问题。在蔡锷看来，“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发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而中国国魂则是“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的特色，以认为吾族之国魂，盖查乎其不可得矣！”

在辛亥革命前，国魂问题的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一个表征，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达到了新的水平，蔡锷把“军国民”与“国魂”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提倡具有民主内容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1901年，蔡锷又写了《致湖南士绅书》，文章以很大篇幅叙述了日本由于改革而强盛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今天的现实是“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而统治者却“日日酣嬉”。他幻想、希望和要求湖南的当权士绅们能够向日本学习，集巨款、开译局，进行改革。蔡锷认为，“只要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他这封给湖南巡抚及当地士绅的信，请其力行新政，以为各省倡，在我国东南地区颇有影响。

蔡锷在留学日本期间，虽然年幼，却比较活跃。1901年与杨笃生、梁鼎甫等旅日湘人创立湖南编译社及游学编译社，又倡议创立留学会馆，并在成城学校内设立校友会，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继而湖南、浙江之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为盟，以倾覆清廷”。后又与黄兴等人组织义勇队（即国民教育会）。1902年，蔡锷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8月，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11月，与蒋百里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不久便补为官费生。1903年11月，蔡锷毕业于东京士官学校。在100多名毕业生中，蒋百里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蔡锷名列第五，被誉为“穷于资而富于学”。蔡、蒋二人与张孝准同时毕业，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蔡锷结束了留日生涯，于1904年初返回祖国。

由于蔡锷曾致书湖南巡抚赵尔巽及当地士绅，请其力行新政，不各省倡，故在东南封疆大吏中，他的声望很高。江西巡抚夏时在蔡锷归国后，首先聘

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后为材官学校总教习及监督。1904年12月，蔡锷因编译社事务亟须结束，乃辞职去日本，未了事务处理完毕，他便返回湖南邵阳省亲。

1905年初，湖南巡抚端方聘请蔡锷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8月，广西巡抚李经羲又聘蔡锷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官，又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蔡锷便带领雷飙、谭道源等10名学生赴桂就任。后来，这些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蔡锷领导辛亥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的得力助手。蔡锷相继又兼新练常备军总教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他还曾在广西创办测绘学堂，自任堂长；创办广西陆军小学，自任总办，以雷飙为监督。广西陆军小学共办4期；先后毕业学生数百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后来名噪一时的人物，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蔡锷创办的陆小为官费学堂。这所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办事认真。李宗仁考上了陆小第二期，可是仅因报到时迟到了10分钟，就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直到李宗仁次年考入第三期，才得以入学。由于广西陆小的教官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故训练摹仿日本方式，十分认真。教官们身着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脚穿长筒皮靴，腰间佩带明亮的指挥刀，威风凛凛。李宗仁曾回忆说：“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更是对他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30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袁世凯以全国练兵处会办大臣名义主持演习。蔡锷奉令观操，并派为秋操演习的中央评判官，雷飙为随员。秋操演习完毕，蔡锷又赴北京考察军事机构，即而返回广西。1910年，他在广西还担任了兵备处总办（后改为参议官）、新编常备军第一标标统、龙州讲武堂监督、广州混成协协统、学兵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等职。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南方与革命党人的接触，蔡锷在广西任职期间，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原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与梁启超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分歧。蔡锷更倾向革命，他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常给以同情和支持。1907年，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和赵声在镇南关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前夕，曾改名换姓，密访蔡锷，有所计谋。可见蔡锷与革命派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10年11月，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召，送母回湖南老家，遂赴云南任职。

重九起义

1911年初，蔡锷来到云南。7月，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兼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蔡锷曾对人讲过：中国如欲强大，就必须起码打败一个入侵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这也就是他的办军宗旨。蔡锷所在的十九镇两协，不仅士兵素质好，器械新置、武器精良，而且在军队中弥漫着革命情绪。军官中，同盟会员及受革命影响的士官生很多。而在全中国革命大

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第十九镇下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的态度更显激进，活动也比较频繁。革命形势和新军中的革命气氛不能不影响到具有正义感和爱国民主思想的蔡锷，他虽然从未流露出对清廷的不满之意，但他却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当时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第七十三标三营见习排长、同盟会员黄毓英曾会见蔡锷，述说革命酝酿情况，要求蔡锷对革命活动有所表示，蔡锷当即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和支持。”

1911年8月，“川路事起，同盟会机关部通告约期起事。”革命党人加快了革命步伐。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接着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川黔动摇，云南的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起来。10月19日，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絜、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在刘存厚家里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酝酿响应武昌起义之事，决定联络“稳慎周祥，可与谋革命之人员”的蔡锷，接着蔡锷参加了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等人举行的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在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决定“联络官兵，期与可靠之官长逐层组织小团体，且与敌血为盟，以坚其信用，而为有把握之举动。”同时要预备子弹，以备急需。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上，由刘存厚、谢汝翼、韩凤楼分别报告各部工作进展情况。第四次秘密会议上，蔡锷及与会者歃血为盟。由殷承在白纸上书写“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6个字，书毕，火化调于酒中，分饮之以结同心。在10月28日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深夜12时发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这次秘密会议对各部作战计划作了严密的部署。

绝壁荒山九月寒，
风尖如刃月如丸。
军中夜半披衣起，
热血填胸睡不安。

会罢，蔡锷回到设在昆明的“云南讲武堂”，低吟新作的诗句，不知疲倦地翻阅着堆满办公室四周的文化、地图和书报，起义日期临近了，负此大任的司令官此时此刻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激情。

10月29日，蔡锷赶往巫家坝，与七十四标及炮标各营管带的革命同志商议落实起义计划。10月30日下午7时，蔡锷以夜间演习为辞，下令各队司务长做饭，8时，又令军需长李和声发给士兵枪弹，以作起义的准备。蔡锷还在七十四标本部召集刘存厚、雷飙、刘云峰等人开会，对起义部署作了具体安排，颁布了军令。但会议尚未结束，只见昆明城内大火冲天，情况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原来，10月30日晚8时余，昆明北校场七十三标第三营李鸿祥所部排长黄毓英等派兵抬子弹，作起义准备，被值日队官追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北洋派军官唐元良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于是起义提前3个多小时由基层发动起来。李根源等立即率领七十三标起义官兵攻破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于是发生了“火光冲天”的战斗。

蔡锷见形势发生变化，知北校场义军提前行动，便当机立断，传令鸣号，集合步、炮两标官长到七十四标本部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报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

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山河，兴我汉室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步、炮两标官兵三呼“革命军万岁”，以示赞成。全体起义将士不约而同地拔出匕首，刷地一下，把象征屈从于清朝的辫子割掉，一面面写着“汉”字的赤帜霎时竖了起来。蔡锷下令整队，出发攻城，以七十四标二营并炮队第一营为一纵队，往攻督署：七十四标一营、炮队二营为另一纵队，占领五华山，进攻军械局；炮队第三营占领东、南两门。蔡锷亲自率领起义军迅速向城内推进。途中遇到奉命阻击的马标，蔡锷争取其中立，又迫使南门外的巡防营归顺起义军。他率七十四标和炮标进城，与七十三标配合，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重九之夜，昆明战斗异常激烈，义军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令人可歌可泣。第二天黎明，朱德（当时升任七十四标二营所属连长）带的一队（连）士兵与另一队士兵一起，在炮火的掩护下，翻过高墙，攻入了云南总督衙门。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总参议靳云鹏化装出逃。士兵们把伪装成苦力的云南总督李经羲从床底下拖出来，挥刀将其辫子割掉，把他押到蔡锷的指挥部，他见指挥这次起义的竟是平时最赏识的蔡锷，当场吓得昏厥过去。这次云南武装起义，宣告胜利。因起事时间为农历重阳节，故又称之为“重九起义”。

10月1日，起义军按计划在五华山成立“大汉云南都督府”，推蔡锷为军都督。蔡锷执政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宣布了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共和、民族平等、革命新政治、保障民权等7条纲领。他任用年轻的有志之士代替贪污腐败的县知事，在军队中也重视提拔青年军官，财政方面大力提倡节约。尤应一提的是蔡锷曾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由于云南全省安定，加上蔡锷采取一系列措施，1912年，云南财政不仅没有发生赤字，反而节余近20万元。这在云南财政史上是罕见的。在教育、实业、交通等方面蔡锷也都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辛亥响应武昌起义后建立的各省政权中，云南都督府是比较有权威的。蔡锷当时也是满怀信心的，他这时期写的两首诗，足以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情。

其一

双塔峥嵘拥翠华，腾空红日射朝霞；
遥看杰阁层楼处，五色旗飞识汉家。

其二

东风吹彻万家烟，迎面湖光欲接天；
千载功名尘与土，碧鸡金马自年年。

蔡锷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他在云南改革的同时，不派出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辛亥云南起义是全国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光荣记录。曾亲自参加援川远征的朱德赋诗赞颂蔡锷，摘其中三首：

其一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成功一夕庆开场。

其二

靳逃钟死人称快，举出都督是蔡锷。
五华山上树红旗，出师两路援川鄂。

其三

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兄弟。
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

脱身归滇

1912年，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窃据了临时大总统职位。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举兵讨袁。革命党人电约蔡锷同时起事，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不愿轻举。讨袁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投奔滇军，蔡锷爱才心切，加以委用，却遭到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写信给蔡锷，调他赴京。蔡锷于1913年10月到京，袁世凯多方笼络，加以“昭威将军”头衔，还将“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长”、“参议院参议”等一个又一个要职委任于他，表现上看这些职务都很高，但并无实权。袁世凯企图用高官厚禄和繁忙的事务锁住这位威名远扬的军事家。开始，蔡锷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打算在京干一番事业。他发奋编著，组织翻译军事、经界方面的书籍，短期内完成了《军事计划》、《中国历代经界纪要》等书。可是蔡锷的积极性没有维持多久，就被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和卖国行径所扑灭，才知道上了袁世凯的当。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竟卖国求荣，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蔡锷怒不可遏，他在参议院慷慨陈词，情绪激昂地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力主拒绝“二十一条”，下最后作战的决心。接着又制定秘密作战计划上书袁世凯。袁世凯感到蔡锷是他当日本卵翼下儿皇帝的障碍，于是，派出侦探对其严加监视，把蔡锷变相软禁起来。袁世凯封建专制的倒行逆施，使蔡锷对其所抱的幻想被铁的事实所粉碎。逐渐产生好武装讨袁的念头。

当时，全国除云南、贵州等省外，大都是北洋军阀控制的地盘。蔡锷要想起兵讨袁，必须回到云南，依靠原来的旧部，然而蔡锷在京受到袁世凯的严密监视，回云南是十分困难的。

1915年8月，“筹安会”在京成立，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即8月15日，蔡锷从北京搭乘晚车去天津，同梁启超等人商议讨袁计划。为了不使别人察觉，他们把房内的灯火熄灭，低声细语地商谈了一夜。在讨论中，他们感到袁世凯势大，自己力量不足，但还是决心发动起义，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当时蔡锷十分肯定地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据，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4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谋划云南在袁称帝后立即宣布独立，贵州、广西相继响应，然后，以云贵的力量攻四川，以广西的力量攻广东。此后，蔡锷常去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讨袁大计。正是在这一时期，一向生活作风严谨的蔡锷也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寻花问柳、狎妓作乐起来。他假装富商，与京都名奴小凤仙搞得如胶似漆，留连忘返。小凤仙是一个孤高多才、富有爱国心的艺妓。她看出了蔡锷寻欢作乐外表掩饰下深藏的忧国忧民之心，有意帮他脱身。小凤仙公开与蔡锷结成生死至交，引起了满城风流传闻。蔡锷被世人称为“风流将军”，他借此更常去八大胡同妓院，暗中却利用八大胡同作为秘密机关接洽地。他索性用重金购买别墅，日夜监

工修葺，宣称将“金屋藏娇”。他挥金如土，大量购置名人字画、古玩金石。但袁世凯并未因此对放弃对蔡锷的戒备之心，他指使爪牙拿一份拥护帝制的“题名录”试探蔡锷，蔡锷毫不犹豫地写了“赞成”二字，并主动地代表云南全省军界上“劝进书”。在这些烟幕的掩护下，蔡锷常带着小凤仙去天津会见梁启超。他与京、津反袁势力频繁联络，与西南军政人士密电往返，被袁世凯探出了蛛丝马迹。袁世凯立即派爪牙闯入蔡宅，翻箱倒柜，检查电报、函件连一张小纸片也不放过，结果一无所获，对此，蔡锷愤然责问、抗议，袁世凯只得用枪毙几个肇事者搪塞过去。

京城不能再逗留了，蔡锷决定秘密逃出北京。蔡锷的母亲、蔡锷的夫人及子女都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无异于人质。初冬一天深夜，蔡锷与夫人密商脱身之计。蔡夫人深明大义，她说：“我不会唱新剧，做不来假戏，若中途被人窥出破绽，岂不误了救国大计？”蔡锷说：“此计也不得已。不然，只能坐以待毙。”蔡夫人忍辱负重，含泪答应“唱”一出“新剧”。第二天，蔡府闹翻了。蔡夫人一反常态，骂蔡锷迷恋妓院，有辱门风，不治家业抛弃骨肉。蔡锷气愤不过，拔拳撕打。蔡夫人一气之下把价值重金的古玩、瓷器、镜屏等砸得粉碎。待蔡锷友人及邻居闻讯赶来相劝，两人已伤痕累累，满地是器皿碎屑。经调解，蔡锷愿出赡养费数万，与夫人离婚。蔡母表示不满儿子沉迷酒色，也舍不得孙儿，与蔡夫人及子女一起，当即收拾行李，嚎啕出门，离开了京城。第二天，京城各报绘声绘色地报道了“风流将军”的离婚秘闻及其“启事”。袁世凯知道了这件事以后，略微松了口气，说：“松坡家事尚不得了，何暇问国事！”但他对蔡锷的监视，却丝毫没有放松。

10月11日，蔡锷化了装，乘坐一辆骡车，从西便门出城，直奔天津医院。经医生“诊断”，患了第二期肺病，病势严重！这时袁世凯的侦探尾随而来“探病”，拿了医生的诊断书，立即报告了主子。12月初，养病的蔡锷换上和服，改扮成日本人，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蔡锷到了日本，致书袁世凯，内称：“家庭变起，郁结忧虑，至患喉痛、失眠之症，欲请假赴日就医，又恐公不我许，故微行至津东渡。”蔡锷还预先写好十几封信，排好日程，说他今天游什么山，明天玩什么水，嘱咐友人隔日付邮寄给袁世凯。就这样，一面继续迷惑袁世凯，一成乘船经上海转台湾、香港，在越南境内乘车进入云南。蔡锷途经滇越路的蒙自，遭袁世凯布置的侦探阻击，幸亏蔡锷智勇双全，才免遭毒手。经历了千辛万苦，他终于在12月19日抵达昆明。消息传到京城，袁世凯恼怒得捶胸顿足：“我一生骗人，不意今日被蔡锷所骗！”

护国袁讨

数月来，比真枪实弹更惊心动魄的智斗，加上万里辗转跋涉的辛劳，长期的喉头结核，使蔡锷本来削瘦的身体，更加羸弱。当朱德再一次看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时，只见他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眼还闪闪发光，声音很微弱，必须极留心才能听得清。蔡锷虽发音困难，但“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象宝剑。”

蔡锷回到云南，不顾虚弱病重的身体，不及休养，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他统一了各派力量，并说服了老部下、云南将军唐继尧参加起义。蔡锷抵昆明的前6天（12月13日），袁世凯已宣布接受帝制，反袁起

义便刻不容缓了。蔡锷于12月20日、22日召开了两天紧急会议，决定先礼后兵。23日，以云南都督与巡按使的名义，通电袁世凯，现令其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并限他24小时内答复。袁世凯假装糊涂，电询此电真伪。蔡锷不与袁世凯周旋，于25日在昆明护国寺宣告云南独立，组成维护共和政体、反对复辟帝制的“护国军”，向全国各省通电讨袁。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发四川，进图湘、鄂；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发广西，进图粤、赣；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护国寺首倡“护国”的消息一传出，昆明各界人民顿时欢声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的口号，在群众箪食壶浆的欢送下，护国军庄严出师。

袁世凯获悉云南独立和护国军大举向四川进攻的消息，十分惊慌，立即任命曹錕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率兵入川，企图阻止护国军的进攻。

讨袁战争开始时，云南仅有兵力2.2万人。蔡锷率领的4个梯团，不过3130人，且大部是二等以下的兵。而四川驻扎的，是袁世凯最精锐的部队，粮饷充足，仅川南就有4个师。袁世凯陆续派出不下8.2万人，双方兵力十分悬殊。蔡锷清醒地估计了敌我情势，在军事指挥上，注重山地战、近战，发挥士气优势，以少胜多。他对胜利充满信心，指出：“弥月来周游万里，细察各处情形，多为始愿所不及。综言之，人心团结，气象发皇。”

1916年2月，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宣布反袁独立，率5000人马与蔡锷主力部队汇合，决战川南4个师（约2万人）于纳溪、永宁（今叙永）、泸州一带。这就是著名的“叙泸之战”。从2月初到3月中旬的40多天里，纳溪三易其手，叙府得而复失，这是迄1916年中国自从用枪炮作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总司令蔡锷虽身患重病，却身先士卒，在纳溪第一线指挥作战。出师时带的粮饷和弹药用完了，兵士伤亡惨重，蔡锷一封封电报，向留守云南的唐继尧告急求援。但唐继尧反袁的目的，并非“护国”，而是在于保存云南实力，竟无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补充和支援。由于子弹告罄，迎战最悍顽的第七师时，虽然稳操胜券，却不能一鼓作气加以全歼，眼看着被打垮的敌人从手中逃走。怎不令总司令蔡锷怅然长叹！

尽管战局几乎陷入绝境，蔡锷并没有丧失信心，他用自己的榜样力量鼓起士气，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作战。他每日睡觉不到3小时，吃的饭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士兵们在主帅的革命精神感染下，虽然衣衫褴褛，半饥不饱，但没有一个人想退却，在极艰难的泸州前线坚持下来了。将士的同仇敌忾，激起了蔡锷的澎湃诗情，他不禁挥毫赋诗：

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奸险最难平。

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

3月15日，广西宣告反袁独立，打乱了袁世凯阻击护国军的作战部署。形势好转，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大为振奋，立即转入反攻。3月17日，蔡锷再次下令进攻，不到几天就攻占了江安、南溪等县。北洋军在护国军的打击下，死伤惨重，全线崩溃。这时，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袁运动，袁世凯在各派反对势力的压力下，被迫于3月22日宣布撤消帝制，并委派徐世昌、黎元洪等与护国军谈判。蔡锷表示：要么袁世凯退位而安天下，要么将护国战争打下去，二者必居其一。3月31日，蔡锷同意停战要求之后，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袁世凯的一些心腹，如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芑铭也纷纷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做完了皇帝梦，在

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民政长。在四川半年多的艰苦转战，使蔡锷的喉病恶化，声带嘶哑。部下要他静心养病，他地却用微弱的的声音说：“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现在做的事，可能会决定西南乃至全国的命运，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在床上休养不到两周，蔡锷便坚持去成都赴任。到任后，喉间肿痛更甚，饮食难以下咽，伴以连续高烧，医生诊断他的喉头结核已至晚期，只有去上海或日本的专科医院治疗，方有治愈希望。这位拼死征战的将军，这才离开他眷恋的战场，搁下他建设四川的规划，于9月赴日本就医。

1916年11月8日凌晨4时，蔡锷困积劳病重，不幸病逝于东京福冈医院，时年仅34岁。

孙中山先生对蔡锷的品德和功业作了极高的评价，为他亲笔书写了挽联：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孙中山先生比蔡锷为投笔从戎的班超和功在东汉的马援。1917年4月，蔡锷的遗体运回故乡湖南，在隆重的仪式中，葬于长沙岳麓山。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 ——冯如

1909年9月22日，在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机场的上空，有一位青年驾驶着自行设计和制造的飞机，翱翔了2600多英尺后安全降落。次日，《加利福尼亚美国人民报》上出现了一条醒目的标题：“华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此事曾在欧美国家引起很大的震动，赞叹和羡慕之声亦随之四起。这位为中华民族争得光荣的青年，就是旅美华人冯如，那时他年仅26岁，正值青春年华之时。

冯如（1883—1912），原名九如，号鼎三，1883年12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牛江区杏圃村。父亲务农，家境贫苦，冯如有4个哥哥，但都先后夭折。家里只剩下他一个男孩，故父母爱之甚切。

冯如从小就很聪明，读书的时候，经常名列前茅，深得教师的喜爱。他喜欢自己动手，模仿近代机械的式样制造一些模型。例如用火柴盒制作轮船等物，做得很用心，模型也非常的逼真，常常博得乡人的称赞。

长到12岁时，由于生活所迫，冯如由一位表亲带往海外谋生。小小的年纪就离开故土乡人，远涉重洋，飘泊到美国旧金山。抵达美国后，人地生疏，幸好那里的华侨多，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冯如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耶稣教会当勤杂工和机械工。

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华侨普遍遭到歧视和种种的剥削，冯如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并没有向环境屈服，白天做完工作后，晚上还坚持到夜校补习英语，这样过了一个时期，他的英语有了相当的基础。

冯如看到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发达，就立志苦学工程技术，他曾经对人说：“国家要富强，必须工业发展，而工业之中，尤以机器的制造最为重要。今天中国贫穷落后，要帮助祖国工业的发展。必须学习机器的制造技术。但是当时旧金山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排华较激烈的一个地区，冯如找不到适当的机会学习这方面的工艺。

1906年，他几经周折，才托人介绍到美国东部的纽约，进了工厂做工。从此他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孜孜不倦地刻苦地钻研了几年，掌握了不少的机械制造技术，在机械学和电学方面，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他除了熟练地通晓当时的30几种机械的原理和制造技术外，还独出心裁地制作了两种新式的机器——抽水机和打桩机，受到人们欢迎，得到普遍采用。特别是他制成的无线电报机，能发能收，效能灵敏准确。当时无线通讯问世还不太久，他就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难得的。

1904年，冯如从纽约回到旧金山，一些华侨青年慕名前来向他学习，他就收了广东同乡朱竹泉、朱兆槐和司徒碧等为徒，热心传授技术。这时（1903）离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已有3年，各国虽然不乏研究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的人，但总的来说，整个航空技术尚处于襁褓阶段，大家都在摸索之中。冯如预见到飞机的军事价值，就萌发了制造飞机的念头。当时正值日本和帝俄为争夺在华利益发生战争结束不久，冯如目睹帝国主义蹂躏祖国东北的领土，同胞遭殃，愤慨万分。他对同伴说：“日俄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太大了。”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竞相争斗的时期，飞机是国防不可缺少的武器，他的功效比军舰大，耗资数百万元去制造一艘军舰，不如用这钱制造几百架飞机。假如中国能有千百架飞机，分守各个港口要塞，就足以防御

列强的侵略了。为此，他曾誓言：“我听说兵器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飞机，誓必身为之竭，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无宁死。”他下定决心，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制造飞机。

冯如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不久他带领徒弟潜心钻研飞机制造及飞行技术。他们踏遍旧金山的图书馆和书店，收集有关的滑翔、飞行技术，以及飞机、滑翔机结构资料，并且先研制飞机的模型。要从模型制飞机，进行飞行试验，必须有一笔相当的资金，冯如自己是拿不出这一笔钱的，幸好旧金山是华侨聚集的地方。冯如带着飞机的模型，到侨胞之中，宣传制造飞机抗击列强侵略的重要，平日华侨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爱国之心早已蕴藏胸中，听到制造飞机可以救国，都纷纷出钱支持。于是冯如在侨胞们的帮助之下，组建了一个“广东机器制造公司”，招集股本，初步筹集到约1000美元的资金，准备制造飞机。

在广东制造机器公司的招优股简章里规定，这个公司要在美国以东的奥克兰市设立一个制造厂，制造两架飞机，待飞机飞行成功以后，再扩大招集股本，迁回祖国，择地设厂，或者兼造各种机器。这个公司由冯如担任总机器师。

1907年，冯如在华侨资助之下，在奥克兰租厂开工，开始制造飞机。次年，制出第一架飞机，运往达林可市的麦园试飞，但没有成功。正在这个时候，冯如在奥克兰的工厂又失火被焚，所有的设备都付之一炬。冯如受到双重打击，但并不灰心，他立即因陋就简地在麦园就地支起棚屋，继续制造，又遭到多次失败。

冯如等人在每次失败后总是细心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再接再厉。经过好几次大改进，1909年2月，又制出一架新机。冯如兴致勃勃地进行试飞，但只上升了几丈高，忽然失控坠地撞毁，幸好人未受伤。

这时，原来凑集起来的资金已经耗费十之八九。股东们见飞机屡次失败，逐渐失去了信心，不愿再投资本。同时，冯如的父母也因思子心切，万里投书，催他回国，他在此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刻，不愿事业半途而废，毅然宣称：“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冯如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学徒们节衣缩食，凑出最后的一点钱作为制造飞机的费用，并特别注意研究飞机在飞行中的平衡和操纵的问题。有一次，他偶看到一只老鹰自由翱翔，他细心地注意它的飞行姿态和两翼伸展的情况。回来以后，又向邻居借白鸽一只，仔细地用尺测量了它的身躯和两翼的长度，计算了二者间的比例，从这里得到了启发。他兴奋地对学徒说：“这下飞机有成功地希望了。”于是他进一步改进了飞机的设计，并加紧制造。

冯如等人经过二、三年的刻苦钻研和顽强劳动，经过大小十几次的修改，终于制成了一架真机翼、方向舵、螺旋桨和内燃机等大小零部件全都是由自己制造的莱特式飞机。1909年2月22日，冯如满怀信心驾驶这架飞机，顺利地升入旧金山奥克兰机场的天空，展翼翱翔了804.7米，然后安全地降落到地面。这是海外的炎黄子孙第一次驾驶着自制的飞机所作的成功的试飞。它的航程比美国莱特兄弟1903年首次试飞的259.7米超出两倍。在海外奔走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这时正好在美国，也到场参观了试飞表演，他对冯如的成功及其奋发图强的精神表示称赞和鼓励。他紧握冯如的手感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他为海外华侨有这样的人才感到高兴。次日，《加利福尼亚美国人民报》即以“华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为题，报道了冯如这次的试

飞经过和今后改进飞机的计划。

冯如受到这样的鼓舞，股东们也继续投资支持，于是他又不断地改进飞机的结构，使其性能逐渐提高。1910年，经过10多次试飞，飞机的性能又逐渐提高了不少。正好这年10月国际飞行协会在旧金山举行飞行竞赛大会，冯如带着自己设计和制造的新飞机参加比赛。以比赛中，他的飞机的飞行高度达210米，速度每小时达105公里，沿着海湾飞的距离约32公里，一举夺得桂冠。前往参加的华侨无不感到扬眉吐气，他们围在冯如的周围，久久不肯离去。美国报纸和华侨各报一时竞相载文，予以好评，国际飞机协会发给冯如优等证书。冯如再次为华侨，也为中华民族早期世界航空史上赢得了声誉。

冯如制造飞机成功以后，誉满海外。美国有人想用重金聘请他教授飞机技术，为美国效力。但是冯如一直想把自己的技术献给祖国，不愿在国外成名立业。他说：“我不能忘记祖国。我衷心地希望把自己菲薄的才能贡献给祖国。”于是他谢绝了美国人的邀请，决计返回祖国。

1911年3月22日，冯如带领他的三名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碧）坐船回到了阔别16年的家乡。冯如回国的时候带回两架自己制造的飞机，其中的一架翼展为8.9米，弦长1.37米，使用功率为3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螺旋桨的转速为每分钟1200转，另一架则装有功率为75马力的发动机。4月8日（“黄花岗起义”前19天），冯如则自家乡探亲来到广州，就赶到市郊燕塘试演飞行。此事不仅在广州，就是在全国也都是件新鲜事儿。广州全城，万人空巷，不论清朝官吏还是老百姓都去观看。

不久，冯如将在国外筹建的广东机器制造公司迁回祖国，在广州郊区择地设厂，从事机器和飞机的制造，并将这个公司改名为“广东飞行器公司”。这个公司的合约写明它的宗旨是为了“壮国体，挽利权”。这是我国以私人资本创办的第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公司迁回国后，制造飞机的物质条件较差，但冯如就地取材，使用我国盛产的木、竹等材料进行制造，克服了材料的困难，为航空事业开辟一条取材的新途径。

这年10月，武昌起义，各地纷纷宣告独立，拥护共和，响应推翻清王朝。11月9日，广州光复。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冯如认清自己前进的方向，毅然参加广东革命军，被任命为陆军飞机长。冯如立即出来组织北伐飞机侦察队，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后来因为“南北统一”，这个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1912年8月，冯如为了提倡飞机制造，在人民群众中普及航空知识，呈请广东革命军政府批准于25日上午11时，在广州市郊燕塘举行飞行表演。这一天，天气晴朗，闻讯来参观的人很多。冯如头戴装着风镜的飞行帽，脚踏一双长筒靴。起飞以前，他先向来宾们详细地介绍了飞机制经过和飞机性能等情况，接着就驾机凌空而起，朝东朝方向飞去。飞机越飞越高。距离也飞过了大约5公里。飞行中，飞行操纵灵活，翱翔自如，沿途观者人头攒动，掌声不绝。但是，冯如驾驶的这架飞机自从运回国内后，在燕塘已闲置了一年多，有些机件已经生锈。冯如想让飞机飞的更高一些操纵时用力过猛，机身急剧上升，头高尾低，失去平衡，动荡得很厉害，终于失控下坠。掉到地面以后，冯如的头、胸、股各部都受了重伤。红十字会紧急抢救，但由于药品的不足，这天又适逢星期日，陆军医生外出，终于赶治不及。临终前冯如嘱咐他的助手们：“我死了以后，他们不要为这件事而丧失前进的信心。要知道，飞行中的牺牲总是难免的……”

冯如牺牲时仅仅 29 岁。

9 月 24 日，广东各界人士在冯如坠机牺牲的地方召开了追悼大会，以表达对这位中国飞行先驱的悼念。广东革命军政府决定按“从优照少将阵例”给冯如以挽恤。孙中山先生特别嘱咐将冯如安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左侧，让这位爱国华侨科学家的忠魂，永远伴随着革命党人的英灵，教育子孙后代。

中国铁路应修自中国

——詹天佑

从北京通往内蒙古的铁路，经过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时可以看到巍然屹立着的铜像。铜像的面容沉毅而安详，目光眺望远方象征中华民族雄伟气魄的万里长城。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1861年，詹天佑出生在广东南海（今广州）一个没落茶商的家庭。他小时候正是清朝开始兴办洋务的时代。1870年，洋务派官僚曾国藩为了培养洋务人才，计划招收一批幼童，用官费送往美国留学。消息传来，福建、广东一带家境不太好的人家，都送孩子去应考。詹天佑考中了，1872年和其他孩子共30人，动身前往美国。

詹天佑12岁到美国，一住10年，由小学而中学，最后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他学得刻苦，成绩相当好，毕业时数学考试得了第一名。

1881年，詹天佑学成回国。轮船乘风破浪在大海里航行，他倚着栏杆，仰望翱翔的海鸥扑击海浪的雄姿。他的心飞得更远，早已飞回了太平洋彼岸的祖国。在10年留学生活中，他目睹美国烟囱林立的工厂，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对比之下，深深感到祖国的落后。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发奋地学习科学技术，正是为了学成一身技艺，好回来报效祖国。

詹天佑和他的同学回到中国时，曾国藩已死，掌握清朝军事，外交大权的，是另一个洋务派官僚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打着“自强”、“新政”的幌子，虽然也办电报、电灯、轮船、铁路，但他更关心的是买军火，办海军，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詹天佑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报到后，却被派去福州船政局水师学堂，学海船驾驶。

在国外学习土木建筑的詹天佑，现在要改行学海船驾驶，几年的功夫白费了，感到很是伤心。但他还是去了，而且学得很用功，一年以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福建海军军舰上当驾驶官。1884年，他还参加过中法海战。福建海军在中法战争中被打垮。詹天佑转到天津、福州、广州各处海陆军学堂去教书。

詹天佑回国后，就这样度过了7年。1887年，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国铁路公司在天津成立，准备修筑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他得到老同学的推荐，到公司当上了一名工程师。为祖国兴修铁路，改变南船北马的落后交通状况，是他多年的愿望。这时，他的心情激动不已。

中国铁路公司的资金100万银两，是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来的，因此这个公司受到英国的控制，总工程师是英国人金达。詹天佑被派去指挥塘沽、天津之间的铺轨工程。他只用了80天时间，就完成任务，初步表现出才能。

1888年9月5日，唐山、天津铁路全线通车后，李鸿章决定把它继续展修，西到通州（今北京附近的通县），东出山海关，称为“关内外铁路”。

金达妒忌詹天佑的才能，故意把他留在天津公司里，不让他去工地。1890年，铁路向东修筑到滦河河岸时，遇到了困难。滦河涨水时，水流湍急，很难打桩。金达先后请了英国的、日本的、德国的工程师来承担，都一一失败了。眼看交工期限将到，最后他不得已才决定把詹天佑招来。

詹天佑仔细分析了外国工程师用过的办法，研究了滦河河床的地质，又认真作了测量和调查。最后决定改换地点，采用中国传统的造桥方法，配合必要的机械，终于把桥桩打了下去，顺利完成了滦河大桥工程，使那些自

命不凡的外国工程师感到惊讶。

1894年，铁路筑出山海关，向东北延伸。正当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关内外铁路工程被迫停顿下来。詹天佑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每天坐着压道车到各地巡查。他热爱每一寸铁路，每一座桥梁，简直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儿女。

《马关条约》签订后，铁路得以继续修建。但1899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八国联军开到中国进行镇压。他们杀人放火，还强占铁路运兵，关内外铁路又被英国军队占领。直到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英国军队才从关内外铁路撤退。但是，英国强迫清朝政府承认，这条铁路在必要时得替英国运兵，铁路的财政和人事也要受他们支配。詹天佑这才明白，外国侵略者抢着要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原因所在。

1900年以后，中国人提出了自己修筑铁路的要求，清朝政府也设立了“铁路矿务总局”，准备拨用关内外铁路的一部分余利，来兴建从北京通往张家口的京张铁路。

因为关内外铁路是向英国人借钱修筑的，英国这时就提出，新修京张铁路，必须聘用英国工程师。帝俄公使立刻抗议，说根据过去签订的条约，中国长城以北的铁路，不能由第三国承修，新路只能由俄国人包修。两国为此相持不下，争吵了一年多，最后才达成协议，如果中国用本国的经费和工程师兴修京张铁路，“两国可以不必帮助”。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京张铁路必然无法动工，即使动工也定会中途失败，将不得不向他们求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兴修京张铁路的任务。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一些外国人听了，公开讥讽说：“建筑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怕还没出世呢！”

1905年，詹天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领工程技术人员着手勘测线路。他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从北京到张家口，全程200多公里，中间横亘着崇山峻岭。最高的关沟地带，共有20多公里，包括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一处比一处高，以八达岭为最高峰。这一带尽是悬崖峭壁，坡度极陡。

詹天佑背上标杆、经纬仪，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夜以继日地奔走在深山野地。塞外常是风沙满天，吹得人睁不开眼，稍一不慎就会率进万丈深谷。詹天佑先后勘测了三条线路，为了寻找一条最好的线路，他来回奔走，白天测量，晚上在帐篷中就着灯火绘图，一遍又一遍地复勘定线。他常提醒助手们说：“诸位可曾想到，你们肩上的责任多么重大！”他还告诫年青人：“工程技术第一要求精密，不能有一点含糊草率，‘大概’、‘差不多’这类字眼，是不允许出自我们工程技术人员之口的！”他的认真负责精神，鼓舞着人们同心协力，精神百倍地工作。

12月中旬，工程开始了。随着工程的进展，困难也迎面而来：由于缺乏机械、轻轨，一切工作都靠人力；沿途许多皇亲贵族的墓地，大都不让通过，得向权门奔走呼吁；英国汇丰银行有时还故意拖延工程款，使经费接济不上……

詹天佑若心焦虑，排除万难，一寸一寸地把工程推向前进。铁路筑过南口以后，共有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处隧道，总长度1645米。这是全部工程成败的关键。詹天佑下定了决心，一天不通居庸关、八达岭的隧道，就一天不回北京。

居庸关山高岩厚，施工十分困难。为了加快开凿进度，詹天佑采取以南北两端向中心对凿的方法。但是，人力凿山，进度很慢，詹天佑又大胆地提

出炸开岩石的办法。用炸药开山，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创，施工进度果然加快了。隧道越凿越深，凿到几十米时，洞里哗哗地流出泉水来，工人们半身都浸泡在泥水里。因为没有抽水机，詹天佑从早到晚带头向洞外挑水，和工人吃住一起，常常半个月不离开工地一步。

居庸关隧道打通了，接着又要开凿八达岭隧道。这个隧道是居庸关隧道的3倍长，这样长的隧道，南北对凿是不容易对准的。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詹天佑又研究出一种凿竖井的开凿方法。即从隧道中点的山顶先凿开一个洞，直往下凿。凿到应有的深度后，再分开向两头凿去。这样可以有4个工作面同时开凿，也不会凿偏了。工人们的热情都很高，没有多少天，这条全长1145米，在当时世界上还是少有的长隧道终于开凿成功。

两大艰险工程竣工后，其余石佛寺、五桂头两处隧道，也跟着顺利完成。

这时还有最后一道难题有待于解决，就是从南口到八达岭地势太陡，铁路虽然筑成，火车却上不去。詹天佑在线路上奔走，和工人们商量，向老乡们请教，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南口与八达岭之间的青龙桥附近，把铁路筑成人字形。火车上下坡不必直走，有了个喘息，停步的地方，坡度减小了，行车的危险也减小了。他又设计了一个特别大的火车头，当火车上山的时候，先用这车头在后面推，一直推到人字形铁路的顶点，然后转身拉着列车往上爬，一直爬到山顶。

由于詹天佑认真勘测，精心设计，亲身在工地指挥和参加施工，京张铁路的工程进展迅速。到1909年7月4日，就全线铺轨完工。工程进行时，许多外国工程师在一旁冷眼相看，不相信中国人能自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程。他们曾嘲讽说詹天佑不自量力，甚至说：“不过白花几个钱罢了！”有人还不怀好意地来工地张望，巴望工程早点失败，好来抢先接手。金达也亲自来过。现在工程终于顺利竣工了，着实叫他们吃惊不小！

10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这条原计划要用6年时间完成的工程，只用了4年，还节省了28万两银子的工程费用。詹天佑的这一卓越成就，确是为中国人争了光。

京张铁路修筑完成后，詹天佑建议再把它向内蒙古延长。但清朝政府这时已腐败、衰弱到了极点，再也没有力量举办这样大的事业了。

这时，商办的粤汉铁路正在酝酿，詹天佑被聘为总工程师。1910年，他南下广东，就任这一职务。到1919年4月24日，他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一直都在为中国铁路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22年，人们在青龙桥车站为詹天佑建立了一座全身铜像，纪念这位爱国工程师的不朽功绩。

兴实业 办教育 名噪东南 ——张謇

在中国近代爱国人物谱里，有一位兴实业、办教育、名噪东南的实业家，他就是张謇。张謇为实现其实业教育救国的理想，曾经筚路蓝缕，顽强奋斗，充分表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实业家为中国的繁荣富强的奋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

金榜题名 另辟蹊径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少年时期除就读于私塾外，也曾受过某些耕作营建方面的训练。张謇自幼聪明喜爱读书，父亲张彭年对他尽力培植，期望他科举成名，光宗耀祖。年幼的张謇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他发奋图强，用心学习，十六岁就考中了秀才。1894年到北京参加礼部会试、殿试，他取一甲第一名(状元)，循例例授翰林院修撰。张謇经26年的寒窗之苦，才赢得了科场中的最高荣誉，按着传统看法，“大魁天下”就是登上了通向封建大吏的阶梯，如果仕途顺利，不难爬上宰相的高位，荣华富贵，垂手可得。然而，头名状元的张謇并没有为此感到满足，他却弃官不做，跑去办工厂，当资本家，成了封建传统的叛逆者。

张謇的做法自然会遭到阵阵讪笑讥讽，因为工商末技，素来为士大夫所不齿，弃儒经商更视为伦理道德上的堕落，发生这种特殊的现象，在当时情况之下，对于有救国之心的张謇来说，并非偶然。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满目疮痍，国难当头。张謇为此深受震惊，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甚为不满，每议时事，总是慷慨激昂，有时声泪俱下。

张謇对满清腐朽官吏非常鄙视。他认为当代的“达官巨公”能苟且以保功名的已属上流，其余的不过是患得患失的鄙夫罢了。两广总督张树声、直隶总督李鸿章都曾派人聘他入幕，他拒绝了，并以“南不拜张，北不拜李”，“良禽择水而栖”引为自豪。张謇不阿权势的品质曾为仁人志士所赞赏。

外侮日亟、内政腐败、民族危机加深，刺激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发展。“变法维新”的呼声高涨起来。不少人著书撰文，要求振兴商务、发展实业，通过学习西方来挽救危局。蓬勃兴起的时代潮流推动着张謇摆脱儒家思想的拘囿，开始注目西方资本主义。据张謇自己说，从1886年会试失败后，就有了“中国需兴实业，其责任必士大夫先之”的想法。他感到救亡图存，必须另辟蹊径，从兴办实业入手。但苦于无所凭借，只是在江苏海门农村提倡了一阵养蚕种桑。

张謇名甲天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结果中国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又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苦海中进一步沉沦。《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仅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如狂潮巨浪，排空而来，而且大量的乘余资本也涌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厂、开矿，“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日本一小国反能战胜老大之中国，日本何以强，中国何以弱？张謇的结论是振兴实业，革新教育，才是中国的“救活之道”。他在给翰林院同事的信中说：“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

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因此张謇立志“奋志农工”，走一条离经叛道的新路。

兴办实业 历尽艰辛

开办工厂，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张謇所选择的这条新路却是异常的险峻崎岖。虽然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允许中国人开办工厂，以“挽回权利”，但洋货的倾销排挤，传统的陈规陋习，官府的掣肘牵制，厦捐的夺榨掠夺，都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也是横亘在张謇面前的道道险关。张謇从 1895 年秋筹建“大生纱厂”开始，到 1899 年 5 月把纱厂建成，其间几经艰难，危而复安。

首先是招集股份碰到的困难。张謇虽有功名，却无资本，建厂资本全靠筹集。墨守成规的风气，洋纱倾销的压迫，使许多人对投资新式纱厂怀有戒心，更不敢把大笔银钱交给一个书生去办厂，加上这时上海的棉纺织业不景气，华盛、大纯、裕晋等华商纱厂或想停办，或想出卖。因此纱厂集股格外困难，不久有两个董事由于畏难打了退堂鼓。张謇在迈上实业救国路途的启步之始，便罩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其次，通州和上海的董事协调不一，双方在承担集股份额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上海集股工作毫无进展。筹资集股和建厂的担子全部落在通董特别是张謇的肩上。他为此奔走各国地向相识者诉苦求助，但“赞者一，助者不及一。”一听说集股办厂，有人嗤之以鼻，有人推三阻四，种种面孔，不一而足。建厂一开始，各种开支压得张謇喘不过气，常常为资金不足所苦恼。向各方求援告急的信“几乎字字有泪”。张謇在外四处奔波，有时身上的钱分文无有，幸亏他的书法颇佳，只好用卖字来解燃眉之急。

再次纱厂短缺营运资金。建厂中的种种困难。经张謇等人的努力，总算过去了。张謇后来恰如其分的用八个字进行总结：“千磨百折，仅而成矣。”冲破一道险关，又面临新的困难。纱厂刚刚投产，又因营运资金不足，出现工厂倒闭的危险。张謇多方求助，仍毫无结果。眼看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他横下一条心，毅然决定“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张謇就是这样凭借其坚强的毅力，大胆试验的勇气，使他在屡颠屡蹶之后，总是奇迹般地迎来转机。

张謇对勤俭创业、改善经营管理十分注意，在大生建厂过程中，张謇自家的“生计赖书院月俸百金，未支厂一钱”，“全厂上下内外数十人，除洋工工程师外，一切俸给食用开支，未万金”。张謇还专门制订“厂约”，为各董事、部门、管理人员分别规定了工作职责和奖惩办法。大生投产后，不但较快站稳脚跟，经受住洋商洋货的竞争，而且年年盈余，利润逐年增长，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共获净利 370 余万两白银。张謇并没有为此止步，为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从光绪 27 年（1901）开始，整整花了 10 年的时间建成通海垦牧公司，为大生纱厂提供了廉价原料基地。此外，还先后建立了广油厂、大兴面厂、资生铁厂、大达轮步公司等十几个企业。在辛亥革命前夜，通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大生纱厂的创办成功，不仅是张謇生平中的一件大事，而且鼓励了一些有钱人敢于投资办厂，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倡导作用。

实业辅助教育 以教育改良实业

张謇不仅是个“实业救国”论者，也是“教育救国”论的执行者。他创办实业初见成效后，就积极在本地兴办教育事业。他认为“图存救之，舍教育无由”，“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发展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离不开教育。“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兴；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道，故立学须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张謇不仅大声疾呼，而且身体

1902年春，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之邀，商定筹建一所师范学堂。在国家 and 地方都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张謇乃从办实业所得中抽出资金3万多元，作为开办学校经费；将通州城南的千佛寺进行翻修建造，作为校址。他们先后聘请海宁王国维、义宁陈师曾、泰兴朱东润等到校授课，还曾聘请日本教习村忠治郎、西谷虎二、远藤民次郎等讲授理科、外国史地、日文等课程，开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堂。南通师范的建立及其教育教学经验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后，他用大生纱厂一小部分盈余和募捐所得，又在通州创办了女子师范、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此外还先后创办了10多所职业学校或传习所，包括纺织、农业、商业、医学、商船、蚕桑、铁路、测绘、财会等专业及普通中学。其中纺织、农业、医学比较有名，三校后来扩充为专科，1920年曾合并为南通大学。

20年内，南通地区在张謇的主持和倡导下，先后建立了370余所小学，6所中等学校，4所职业学校，后来又从中分出3所大专学校。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吴县铁路学校、上海复旦学校、龙门师范、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学校等。此外他在通州还创办了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盲哑学校、伶工学社、剧场、公园和医院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

随着通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及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由于他举办教育，成绩显著，受到清政府和社会的重视，1907年被举为江苏宁属教育会长，1911年学部委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成为名噪东南的教育家和实业家。

1926年8月，张謇病故于上海。虽然他的晚年在政治上一步步落伍了，但张謇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行动，大胆试验的勇气，为中国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在历史上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毛泽东曾讲过，讲到中国的轻工业，不要忘了张謇。

爱国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

1917年1月，正是北京的隆冬季节，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在前门外的一家旅馆里，新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会见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蔡元培刚千里迢迢从法国回归北京，顾不得旅途的疲劳，就到处拜访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商讨整顿北京大学的方法。经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蔡元培又专程前往陈独秀的住处，热情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学院院长），共同办好北大。陈独秀欣然接受。这是蔡元培为改造北京大学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蔡元培（1868～1940后），字鹤卿，号子民，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早年，他曾经是清末的翰林。1898年从北京回到家乡——浙江绍兴，担任绍西学堂监督（即校长），这是他在新式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1902年，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又与蒋智由等创办“爱国女学”，蔡元培并在“爱国学社”任教，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与章炳麟、陶所章等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次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参加过秘密研制炸弹的活动。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这是他力图把清朝留下来的封建教育变革成为资产阶级教育的一个纲领。

在这个“意见”里，蔡元培批判了“忠君”、“尊孔”等封建教育思想，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删去，“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主张进行军国民教育（即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为建立“强兵富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服务；主张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这些在当时都具有反封建的现实意义。他同时提出的关于世界教育与美感教育的主张，虽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其指导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了追求一个无时间空间的形态，其实并不存在的“观念世界”。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间，还提倡成人教育，增设社会教育司；特别注重改革高等教育，发布“大学令”等等。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辛亥革命果实为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中华民国”名存实亡，蔡元培流亡国外，他的教育制度的方案也被束之高阁了。

1917年1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到校视事。当时的北京大学十分腐败。在新文化运动迅猛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变革现状的要求日益强烈、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的形势下，蔡元培艰难地实行着他的教育改革的改革的主张。

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自文科开始，因为文科中封建势力最为严重，而改革文科的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建立一支具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这是办好学校的关键。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也先后到北大任教，这样在北大的文科教员中就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派的阵营。蔡元培把大学看成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因此他广罗人材，不少知名教授，新派人物在北大文、理、法科担任教学工作，同时辞退了几名无学问，专门混饭吃的外籍教员，这使得北大的教师队伍更为充实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教员

人数也有很大增加，1918年有教员217人，为1912年的4倍。

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并在管理体制上作了些改革。这以前，学校的一切校务都由校长及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官员决定。蔡元培到任后，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的评议员组成，校长是评议会的议长，学校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评议会通过。各系设立教授会，“由各教授系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同时设立各种委员会，负责学校的各项行政事务。蔡元培实行让懂教育的专家、学者参与学校的管理的办法后，一扫封建社会那种腐朽、没落、专制的“官学”风气，在教育史上是有进步作用的。

在教学思想方面，蔡元培主张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把内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思想，学派都包念进来），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的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能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还认为，众家学说“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现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有许多进步的教员，在宣传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也有不少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教员在讲台上讲课。如“筹安会”发起人之一，拥护袁世凯称帝的顽固派刘师培也被聘来当文科的教员，他极力反对科学和民主，宣扬封建文化。这样，革新和守旧针锋相对。各种思潮，如马列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复古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本意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他说：“我素来不赞成董钟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对立。”这种思想自由的原则，促进了科学、民主的新文化的传播，同时在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设了条件。

蔡元培对学生的要求，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在就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的演说中，要求学生必须抱定求学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要“爱憎分明，孜孜求学”。为此，他首先要求教员认真地教授，以提高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蔡元培认为，大学生学习的知识不应太狭窄，因为许多学科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的最后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的心理学附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因此大学生“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各派的学说，要让学生独立思考，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不是用强制灌输的办法，去束缚学生的思想。

为了活跃学术思想，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发扬学生的自动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蔡元培在北大发起或赞助创办各种团体，如进德会、新闻研究会、消费公社等等，如雨后的春笋一般。每周几乎都有学术讲座，自由讨论的空气很浓。

蔡元培重视图书馆和各种实验室的建设，认为这是办好学校，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条件。当他到校任职仅数日，工作千头万绪之际，就把“改良讲

义”、“添购书籍”这两件事情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之内。他任用名流学者如章士钊、李大钊等为图书馆主任，“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从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当了6年的北大校长，成绩显著，名望极高。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如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等，在北大，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在军阀统治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再度出国。1927年，他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大学学院院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救国，同情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鲁迅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40年3月5日逝世于香港。著作编有《蔡元培选集》。

关于洋务运动 ——清政府的图强尝试

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向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沉沦下去，专制、腐朽的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根基更加动摇。日益衰弱的封建统治和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惊醒了封建统治阶层中的部分先进分子，特别是一部分握有政治大权的官僚象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所谓的“洋务派”。

洋务派是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在长期的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国内人民起义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亲身体验：“洋枪炮，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正是基于这种对洋枪洋炮的朴素认识，使洋务派考虑到要维护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改变中国武器的落后状况。为此，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倡导、参与、组织了一场图强自救的洋务运动。

以“求强”作为口号的前期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

1861年，曾国藩攻陷了太平军的安庆城，为了扩充军备、取得对太平军的军事优势，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这是第一个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军事工厂。从1863年至1895年32年间，洋务派先后建立了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2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由大部分依靠手工生产到采用机器生产，由单纯的生产枪炮发展到生产钢铁、轮船，规模、技术不断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这批军事企业把大批工人组织在机器周围，较普遍地采用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企业的产品由开始的不计算价格到后来逐步向商品过渡，并受到国际军火市场影响，说明价值规律对它们也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其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近代军事工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对于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一系列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洋务派官僚在军事企业中罗致了李善兰、徐寿、华衡芳、容闳等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对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类军事工业所表现的成绩，很不足观。因为技术机械，都仰给于外国，从事经营的人又是毫无能力的官僚，满清末年的腐败官僚，大都把这些厂所当做肥缺优差，搜刮敲剥，无所不至。不但对于事业的经营，毫无热心，即对于本国技术人才的养成一事，亦弃而不顾，一切操作都委之外国技师，本国人至多不过能充当下级职工而已。”近代军事工业属于官办企业，从创办经费到日常支出，都是由政府拨款。组织管理上类似封建衙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作为近代军事工厂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但是它们却上有总督、巡抚节制，下有提调、委员监督，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招收的一部分工匠、工人，虽然具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但仍要受到沉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并且不准随意去留。因此，尽管这些厂局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在生产关系方面，封建性仍然是主要的，并具有一定的买办性。这些厂局的技术、设备和原料都主要地依赖外

国进口，工厂的实际经营、管理大权操在外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手里。洋务派官僚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存在的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买办性是洋务运动中的消极因素。

建立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也开始认识到编练新式海陆军、建立近代化国防的重要性。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摺》中说，列强通商传教，“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佯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因此，编制新式海陆军，建立近代国防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洋务派用或进口或自己工厂生产的枪炮换下了落后的刀、枪、弓、剑，聘用外籍教练，依照“洋人阵式”，编练新式陆军。如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在直隶练的“练军”，李鸿章利用上海的便利条件重新装备训练的淮军，进军西北的左宗棠也购买外国枪炮弹药编练他的湘军。新式陆军的建立和训练对于当时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外御强敌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到 70 年代中期，海防又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我若早一日备豫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弭衅端。”因此，洋务派开始筹建海军，建立新式海防。1885 年 10 月在北京建海军衙门，任命李鸿章为会办。到 90 年代中期，建成了拥有各类舰船六、七十艘的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海防力量初具规模。特别是北洋水师由李鸿章亲自操办，到 1888 年已拥有大小舰只 20 余艘，其中大型舰只如“定远”、“镇远”、“济远”等多购自国外，还在旅顺口、威海卫修筑了炮台，建立了海军基地，具有一定的实力。李鸿章曾自我吹嘘说，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但是洋务派建立近代海防是在唯武器论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而且这时的军事力量就武器装备而言能否堪与外国相匹敌是值得怀疑；他们也不懂得武器装备的发展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战争的胜负与国家制度、政府和决策者在特定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密切联系。再加上洋务派本身在对外关系上的妥协退让政策，这就使得洋务派和军事近代化在外御强敌时收效甚微，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强有力的抵抗外侮的力量。

洋务运动前期是以“求强”为口号的，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发展和新式海陆军的编练，经费开支越来越大，与近代军事工业相配套的大量煤铁供应以及电讯、运输等事业也没有保障。洋务派通过洋务运动前期的实践学习，也深切认识到，师夷“长技”并非仅在火器，军事工业和军队现代化仅是浅层次的，而非根本，本在求“富”，富才能“强”。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随着学习西方的层次深入和观念变革，洋务派开始了以“求富”为目的，以学习西方经济建设、建立民用企业为内容的运动，这是中、后期洋务运动的一个大发展。

从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陆举举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其中重要的有：1872 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6 年李鸿章办的开平煤矿，1880 年在天津设立的电报总局，1890 年建成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20 多个。这些民用企业大部分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的。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封建统治阶层中与洋务派相对立的顽固保守势力如倭仁、徐桐等人唯祖宗之法是

尊，顽固守旧，因循保守，夜郎自大，盲目排斥一切新鲜事物，坚决反对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认为那是奇巧淫技，于国无补。顽固派势力不小，影响很大，严重阻碍洋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外国侵略者必然要对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排斥和打击，以达到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目的。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握有一定权力的封建官僚的保护和支持下，大型的近代化企业如航运、电报、采矿等才能建立和维持下去。比如：上海的轮船招商局，1872年建立之初，就是依照李鸿章借官款创办起来的，后来，外国轮船公司为了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惜采取削价竞争等手段来挤垮它，招商局债台高筑，处境困难。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延期归还官款等措施，使招商局又起死回生，这正是官督商办的特殊历史作用。

当然，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洋务派建立的民用企业必然也存在着一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它们的买办性主要表现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由于近代中国没大型机器设备的生产厂家，当时机器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使得机器的安装、运转到维修都依靠外国技术人员。工厂的创办人和经理，大部分都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封建性主要表现在：经营、管理上的落后、腐败，人员安排中的任人唯亲，对一般商办企业的排斥、打击等方面。比如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在用人方面，“失之太滥”，有的官员引用亲朋好友“至二三十之多，以致船上好舱半为占去”。任人唯亲的后果，一方面，管理困难，人浮于事，贪污受贿；另一方面，拉帮结派，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人浮于事，矛盾重重。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利用其与封建统治阶层有密切关系的特权独占近代企业某一部门的垄断地位，排挤同行一般商办企业。如上海织布局创办之初，李鸿章就上奏准予：“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10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这就保证了上海织布局10年的垄断地位。这种利用政治特权保证垄断地位的结果是排斥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需的竞争机制，不利于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刺激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一部分通过各种手段积累了一定数量货币财富的官僚、地主、商人、买办，鉴于连绵迭起的农民战争给农村带来的不稳定性，不愿再去购买土地；而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巨大的收入又强烈在吸引着他们，推动着他们把积累的钱财投资于近代企业，这就是洋务运动后期的商办企业。

近代商办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产生之初到90年代中期的20多年里，共创办过100多个企业，除开办不久即歇业和投资筹建未成的外，大约有70多个。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建立的继昌隆丝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的公和水缫丝厂，1890年在上海设立的燮昌火柴厂等。这些近代商办企业有的是由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国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而转化为近代企业的。

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商办企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兴办起来的，并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而发展，因此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上的优势延伸到经济领域中，必然在经济关系上也不平等，通过开辟通商口岸，把持中国海

关等一系列鲸吞措施，逐步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中国的商办企业无论就资金、技术、产品、销售、原料供应等诸方面，都无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很多商办企业为此破产。另一方面，近代商办企业还深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摧残，地方官吏任意盘剥、敲诈勒索，使这些本来就底气不足的企业四面楚歌、举步维艰。由于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近代商办企业很难按正常发展的道路独立成长起来。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它们不得不左依右附，不是乞求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保护，就是躲进本国封建主义的翅膀下。因此，近代商办企业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既有深刻矛盾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其力量从发展之初就是脆弱的。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一次巩固统治的图强尝试，它持续了 30 多年，创办了 100 多个各种形式的近代化企业。洋务派作为地方阶级中的开明分子，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力图使清政府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是积极的。但其目的是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从主观愿望上说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就其客观效果上看，它顺应了不断发展的世界形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洋务运动创办了一大批近代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引进了机器生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新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中国旧的经济结构，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国家近代化就是由封闭的、落后的封建社会状态向逐步进步、富强、文明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的近代化不可能按正常渠道独立发展。正是历史把地方阶级性质的洋务派推上历史舞台，“求强”、“求富”，建立了 20 多个军事企业，20 多个民用企业，在它们的刺激和影响下，还创办了近百家民间商办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一定的买办性，但就其性质来说属于资本主义近代企业。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促进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调整、解体和新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它一方面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和重创，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更加现实的客观条件。这种经济领域内的近代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基础，也为近代化本身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近代新式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洋务派举办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开办各种新式学校。如：京师同文馆；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这些新式学校所学课程也不再是传统的私塾课程，而是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英文、法学等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它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再是八股士人，而是具有近代知识的专门人才。

注意翻译西方科技、历史、政治书籍的工作。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于 1868 年设立翻译局，天津水师学堂、京师同文馆都设了翻译机构。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使近代中国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技、历史、地理、天文、外交、法典等实用科学知识。

注意留学教育。洋务派从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开始，陆续派出留学生到英、法、美、德等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知识。这些赴欧美的留学生带回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观念，促进了国内教育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

洋务派通过近代教育的实践，促进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义利观念的变革，使人们开始从封建社会那种落后、封闭的文化心理状态中挣脱出来，对整个社会思想、行为观念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洋务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是随同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诞生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的第一个阶级就是洋务运动 30 年，特别是在民间商办企业发展时间。随着洋务派建立的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民间商办企业的发展，大批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士兵成为受雇用的劳动者，通过与先进的机器生产相联系，变为产业工人。虽然这个时期产业工人的规模还不是很大，到甲午战争前也只有六、七万人，还没有足够的觉悟和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它却已具备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高度的集中性和沉重的政治、经济压迫。由于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同洋务企业的创办、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之日起，就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是洋务派官僚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实际执行者，又由于他们在统治阶层中有着很大的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集中表现在依靠政治特权，利用垄断方法，谋取本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而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在内）转化而来的；一是由于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场主上升而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除少数下层分子外，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封建政府中有一官半职，或在农村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决定了它虽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却又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勇气，这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造就的弱点。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了中国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是主要的革命力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壮大。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一批新型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也诞生了，主要代表人物有：薛福成、王韬、王建忠、郑观应、何启、陈炽等人。他们通过向西方学习，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

想和主张。

他们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仅在经济方面发展是徒劳的，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种认识又比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民主思想，对当时社会的顽固守旧思想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指出“闭关自守”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发愤图强，改革自救；他们揭露顽固派拒绝接受新事物，反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落后、保守思想；批判他们好事不为，无恶不作的行径。为此，他们依据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改革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思想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愿望。

这批新型知识分子还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思想。他们一方面痛斥外强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无穷灾难，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通过谈判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被帝国主义列强夺去的权利，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上有很大进步，而且在实践中还积极主张洋务运动，有的不直接参加洋务运动的实践，比如郑观应，他早年在太古洋行任买办，1882年进入上海的轮船招商局任会办，嗣后又经营织布局。在此期间，由于参与新式企业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洋务运动有了更深切的体验，他指责“官”对近代企业的态度是唯利是图，期望清政府能改弦更张，顺应商情，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地位的要求。

早期新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缘附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要求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打上了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烙印。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主张用谈判方式去解决；他们批判封建主义，却又不要求打乱封建政治制度，只要求在承认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一些改良；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却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提不出革命的主张。这正是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近代社会各种因素、各种条件的制约，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从国际环境看，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对华推行所谓的“合作政策”，但其实质仍然是用有限度地支持清政府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无论变换什么手法都不可能给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其次，从国内环境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城乡还基本上占统治地位；政治上，封建统治阶层中的“顽固派”时刻都在阻碍着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和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顽固派代表了近代中国生关系中最落后、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反映了中国封建生产力的停滞性及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的牢固性，成为洋务运动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最严重的障碍。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因此，按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这个任务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再加上超稳定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形成。这样，近代化的任务一开始便落到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洋务派身上。由于洋务派的组织领导，使得封建地主阶级落后、保守、愚昧、妥协的特点一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体现在洋务派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中，并最终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正体现了洋务派作为地方阶级官僚在向西方学习上的局限性。封建主义是地方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创办一系列近代企业的目的不是破坏这个根基而在于强化它，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当然，客观效果并不是洋务派官僚所希望看到的，随着洋务运动的步步深入，随着人们向西方学习的深入，逐步认识到：要想“富”、“强”，必须建立与新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也就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成熟的时候。当洋务派意识到洋务运动要触及到他们封建统治的根基时，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本能，也必然站到历史进步的反面，这正是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派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在对待外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作为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是与人民对立的，因此，它必然是软弱的，软弱产生妥协。在对外关系上，千方百计地避免与外国兵戎相见，“须力保和局”，“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这种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只能加剧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加深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与洋务运动“求强”的口号是相违背的。当然，这与洋务派对“内忧”和“外患”的认识不无关系，“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而俄、英等国不过是“肢体之患也”。这种反人民的立场与历史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一脉相承。

因此，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打击下被迫提出来的。它缺乏必需的经济基础、阶级力量和思想准备。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宣告了它最终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社会各阶级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独立、富强、文明之路应该怎样走？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人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此后的中国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从反面开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民大革命的先河。

改良救国的失败

19世纪末，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对中国“瓜分豆剖”的狂潮愈演愈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强国御侮成为最迫切的时代呼声。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高举“变法”、“维新”的旗帜，掀起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政治改良运动，并于1898年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这场运动虽然被封建统治者扼杀，但作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登上政治舞台所进行的第一次尝试，无疑震撼了中华大地，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当然维新志士的鲜血也昭示人们：改良不能救国这一客观真理。

一

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一些仁人志士，他们不断进行着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艰辛探索与斗争。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就撰写了《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由最初的“求强”逐渐发展到“求富”，反映了着中国向西方学习认识的提高。

洋务运动导致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走工商致富的道路；在文化教育上主张废八股，学以致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政治上他们初步认识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度。

可见这些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已不仅仅满足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要求在各个领域全面实行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在政治上触及到了国家政体问题，要求以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来代替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虽然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同有或很少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但由于他们的奋臂疾呼，使改革中国的要求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思潮，最终发展成康有为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维新运动。

二

1895年4月，正值京都进行举人会试时，传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一时间在京举人纷纷到督察院上书，掀起了反对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巨浪。康有为亲自起草了长达万余言的上皇帝书，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合签名，于5月2日递交都察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首先指出割地赔款等必将导致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份上书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等诸方面，可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一个政治纲领。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被批准签订为借口而拒绝接受。

上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上书的内容很快被传抄、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它呼唤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使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由此成为公认的变法领袖。

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维新变法思想付诸行动的开始。此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围绕着如何进行改良变法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改良派先后组织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等。他们定时集会，发表演说，宣传维新变法。

改良派还创办了各种报刊，象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报》、天津的《国闻报》、《国闻汇编》等，都刊出过大量宣传变法的文章及著述，并经常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文章、译著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维新思想逐步深入人心，通过一些报刊，使得部分官员“亦渐知新法之益”。

据统计，至 1897 年底，全国成立、创办的学会、学堂报馆等已达 300 余所。改良维新运动已形成全国规模。

维新运动的高涨，激起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仇恨。围绕着变法与否，维新派利用学会、学堂、报刊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出现了 19 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与封建顽固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

改良派与顽固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战。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法是古圣先王遗留下的治国之道，“皇上为祖宗持守宗庙，无权更改祖宗大法”，要“恪守祖训”，否则将“敌”国家。

改良派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反驳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已旧”，故而祖宗之法亦不能不变。清代各项政策的变化如在朝廷增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闭关自守”变为“开埠通商”，由“刀矛弓石”变为“洋枪洋炮”等几事即是绝好的说明。他们又列举俄国、日本变法致强的事实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说明变则强，不变则亡。

第二，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

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提到“设议院以通下情”。改良派认为变法富强的根本在于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对此，顽固派极为恐慌。他们叫嚷：“若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此则亡且宜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民权一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兴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

维新派针锋相对。首先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论证君民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君末也，民本也”，既然君是由民“共举之”，亦可由民共废之，这是“天下之通议”，批驳了“君权神授”说。接着，又以日、俄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强大的事实指出“吾国会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由此得出在中国也只有兴民权、设议院，才能使国家富强。维新派还为兴民权描绘出一副非常美妙的画面：“一乡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俗清；一国之大，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国宁；环宇宙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天下和。民权之说如此，民主之说如此。”

在这个问题的论战上，维新派以充分的理论根据和事实阐述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国民逐步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

第三，要不要废科举。要想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就必须有相应的人才，而在封建制度下诞生出来的科举制度是不能培养出求新求异，具有维新思想人才的。因此，维新派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提倡

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学。

顽固派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么也。”“若废制义取士，人将弃四子书而不读，其害有甚于洪水猛兽。”

维新派反驳指出，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他们嘲讽科举制度下培养的人才，只会死记硬背，“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可笑可悲。

这场论战给顽固的封建势力以有力的冲击，“能变则存，不变则亡”的呼声日益高涨，维新变法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从 1888 年到 1898 年康有为曾先后 7 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颇感兴趣，认为其有利于挽救民族危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当时的光绪受制于慈禧太后，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而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势力很强大，他们仇视并极力反对变法。朝廷内以支持变法的光绪帝所代表的“帝党”与后党的矛盾随着维新运动的逐步高涨，亦日益激化。光绪帝决心推行变法，试图以改良派的力量与“后党”势力抗衡。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从 6 月 11 日到 9 月，光绪先后颁布了几十条新政诏令，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方面，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

政治方面：裁撤冗员，取消闲散、重叠机构，澄清吏治，允许百姓上书等。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设立铁路矿务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等。

文教方面：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改试策论；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游历；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等。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裁减旧军，改用西法操练等。

从新政内容看，除设议院、国会等没有出现，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变法维新的主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文化经济的发展。

被触及到切身利益的顽固派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开始了血腥的反扑。

因为顽固派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特权，光绪帝的新政颁布后，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外，其它各地都拒不执行。在中央，慈禧首先迫使光绪帝革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将其驱逐回籍，剪除了光绪的得力臂膀；其次，迫使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统率董福祥、聂士城、袁世凯三军，控制了京田地区；接着把二品以上官员的安排大权抓到自己手中。

这期间光绪帝也曾抗争过。如把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焯等 6 人一同革职，又委任谭嗣同等维新派以官职等。但这激起慈禧更大的仇恨，她指使荣禄频频调军，加紧策划政变。

因为维新派依靠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所以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时刻惊惶失措，而最终把希望寄托在阴险毒辣的两面派袁世凯身上，导致了政变的加速到来。9 月 21 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进而在全国捕

杀改良派。康、梁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谭嗣同决心为变法流血，于9月28日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等6人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变法失败。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前后正好103天，历史上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既是这场改良运动的高潮，也是其终结。

三

19世纪末，由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导演的这场改良运动，最终伴随着维新志士的鲜血而落下了帷幕，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这场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却将永载史册。

首先，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爱国运动，在此之前，曾有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也有过“求强”、“求富”的尝试。呐喊也好，尝试也罢，都不免带有维护本阶级和本阶层利益的时代烙印，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和一部分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都是在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在民族炮火的洗礼中民族的自尊意识被唤醒，从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积弱不振所进行的富国强兵的艰辛探索，这种探索渗透着抵御外来压迫的积极因素。而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则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要关头对上述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其虽不能和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日而语，但也与封建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丑恶嘴脸判然有别，代表着当时中国新兴阶级力量的时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愿望相吻合。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夺取铁路、矿山等的投资权或筑路、开采权，并通过贷款，掠夺控制中国。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民族灾难，康有为及其他改良派领袖在上书、著作和演讲中都首先痛陈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形势并以此阐明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只有变法维新才是救亡的唯一出路，而变法维新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894年4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并成立保国会时，更明确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所有这些，无不透闪着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民族前途的忧患之情。

其次，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改良派大量介绍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写出了大量倡导新学的文章。由于改良派的积极鼓吹和倡导，中国当时出现了“举国若狂，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西学开始渐入人心，使中国更多的知识分子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初步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而不是亘古不变的。康有为在其《孔子改制考》一书中，附会公羊派的“三世说”，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向前发展的，“据乱世”即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是君主共时时代。严复有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中，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并以此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改良派这种对社会发展的描述虽是不科学的，但他们主张社会向前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从而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打下了“变”的烙印，客观上为以后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作了舆论和理论上的准备。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这对于已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不啻一声惊雷。改良派还通过大量的文章、译著，宣传西方的国家学说和政治制度，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神权观念，并对君民关系作了新的论述。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书》一书中，曾把历代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古文尚书》、《左氏春秋》、《逸礼》等统统论证为伪经。诚然，他的考证和论断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在当时这些经典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情况下，这似一股飓风摇撼了整个社会，它引导人们去怀疑传统的经典，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这一切都旨在引导人们从“君权神授”的神话中苏醒过来，从而认识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封建专制制度。

改良派在运动中，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旧文化、旧教育以及其突出的表现形式——科举制度。他们认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落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在指出科举取士的弊端后，提出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的强烈要求。

严复对汉学、章辞学以及高扬理性的宋学都予以猛烈抨击，指出它们“无用”、“无实”，无救于当前的民族危机，因此，“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切束高阁也”。从而向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和文人学士认定为天经地义的科举制度提出挑战。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积极倡导和宣传，使更多的志士仁人加入到兴西学、图变法的行列中来，有些比较激进的人，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最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由此看来，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客观上为其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培养了部分人才。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并力图在中国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固有属性所决定，这场改良运动又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探索挽救民族危亡道路的实践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且介绍了一些在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尤为注意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政治制度的阐述和宣传，以使人们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为变法求新寻找理论根据。

然而，他们的宣传和介绍谈不上系统，也谈不上科学的借鉴，而只能是一种简单的生搬硬套。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附会公羊派“三世说”的产物，而被改良派誉为“飓风”和“惊雷”；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有过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危言深论。就是这“飓风”、“惊雷”和危言深论，最终也不免落入庸俗进化论的窠臼。他们虽然主张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但认为在中国只能走英日等国的道路，建立具有君主的资产阶级“民权”国家，给人民某些权力作为安抚，使其不起来革命；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即建立没有君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他们只寄希望于清王朝的明君贤臣，而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为内扰和祸水。因此，从他们开始为变法进行宣传那时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必定失败的悲惨结局，以致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社会前

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第二，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纲领看，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学习西方行进的科学技术用以改造落后的中国，把中国由原来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文化教育上反对科举制，要求废八股、倡新学。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全面，却唯独没有提到土地问题。而这正是当时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改良派也认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亟以思良法以救之”，但由于他们是从地方、官僚、富商中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作为新兴阶级力量的代言人，虽然企图跻身统治机构中去分享政治权力并展开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斗争，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第三，正是由于对庸俗进化论的深信不疑和由此而产生的错误的变法纲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运动的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光绪皇帝的忠心和对皇权的拥护，而对帝国主义入侵者又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不可谓不激烈，他们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衰之根源”，“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王”，大声疾呼要“冲决君主之罗网”。然而，这种要“冲决君主之罗网”的勇气，在他们妥协的言论和行动中变得黯然失色。

康有为早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体、方正直言之士”，“准其随时清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并主张凡内外兴革或筹饷等事，均经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这是设议院、开国会的先声，在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中，又一次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到变法前，当需要把一些政治主张付诸实施的时候，康有为却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向光绪帝建议道：“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聱聩，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梁启超亦在《古议院考》一文中说：“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开设议院，取乱之道也。”他们既然把广大人民群众视为愚，那么开设议院之举则变得遥遥无期，宛若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也唯有如此，才能使“龙颜大悦”。

康有为曾标示维新变法的宗旨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梁启超对其进一步发挥，劝告满州贵族不要过份压抑汉人，“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美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对皇帝的愚忠，对皇权的维护之情显露无遗。就连思想、言论最为激进的谭嗣同，在临死之前还说：“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因此，当我们为谭嗣同立志变法所表现出的“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所折报的时候，也不容忽略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忠君思想在这位民族资产阶级志士身上所留下的以身“酬圣主”的悲剧色彩。

可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护、依靠光绪皇帝，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幻想凭皇帝的权威，在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以达到实现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改良派的变法主张确实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不是说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种子可以在封建专制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而只是一种历史的表象。

光绪皇帝之所以支持变法，是基于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内外交困，他不甘

心帝国主义列强的任意宰割，更重要的是为了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势力的控制，亲掌朝政，改变自己有名无实的处境，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某些主张与光绪帝的意图不谋而合，又鉴于当时“帝党”集团力量微弱，改良派也就成为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开展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由此可见，在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去向和目的这些关键问题上，光绪帝与改良派之间存着严重的分歧。

下面再简要谈一下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才加速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倾向才显而易见。康有为在《强学会叙》中曾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瞬，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号召变法维新。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赶走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在整个维新运动中，改良派始终没有敢于正面提出彻底反对外来侵略的主张，而只希望通过变法以自强，然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等条约。这显然是空想。在整个改良过程中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中国的维新变法能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如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亲俄的；而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的维新变法。岂不知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变法的支持，只是在寻找他们掠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一旦改良运动的失败已成定局，维新派向他们求援时，他们便原形毕露了。

第四，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广泛接触南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后，其思想意识上就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就在他们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进行宣传的时候，却又不得不把封建正统思想的祖师爷——孔子作为挡箭牌，这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孔子尊奉为“托古改制”的祖师爷，宣称《六经》全是孔子所作，其中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人的言化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而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显然，康有为是有意利用孔子的权威来为变法寻找历史根据，以减轻变法的阻力。这在封建专制思想阴云笼罩的当时，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斗争策略，而这也恰恰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从千余年来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窠臼中脱胎而出。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局限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对本国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妥协以及由此而在变法维新中所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当然，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绝非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弱点和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这也正是这场运动必然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首先，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它主要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及买办商人转化而来，只有小部分是由市民阶层分化出来的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场场主上升而来的。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独立地，自由自在地发展，只能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缓慢而艰难地行进，所以缺少本阶级的独立意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封建势力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革命性与软弱、妥协性集于一身，正表明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在他们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其次，封建顽固势力的过分强大与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它根深蒂固地植于人们的思想中，并不是一朝一夕即能废除的。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正是这种专制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和极力维护者，他们把持着朝中一切大权。在整个变法运动中，他们百般阻挠、恶毒攻击、伺机破坏。一些投机分子在维新运动高潮时混迹于其中，当运动出现波折时又釜底抽薪；地方上，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尚能支持、参与变法外，其他的或坚决反对拒不执行光绪帝的新政诏令，或见风使舵，最后仍破坏镇压维新运动。

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虽然表面支持变法，但光绪本身是一个傀儡，自己尚处在朝不保夕地地位，其追随者更是自不待言，因此，光绪皇帝所颁布的一系列变法诏令，遭到顽固派自上而下的反对，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总之，光绪皇帝的支持并无损于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所处的主宰地位。

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它无论在产品销售和原料收购方面，都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还要受本国封建势力的严重束缚，所以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力量薄弱，阶级力量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弱小。到 1898 年，近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只有 100 家，资本总额为 1781 万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例，而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们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这不仅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本已弱小的阶级力量中，参与变法者也不在多数。因此，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变法维新运动中一些具体措施的失误，如没能争取军队的支持，在全国尚未形成变革大气候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等，也应当视为导致这场运动失败的不利因素。

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救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都失败了；多少仁人志士苦苦求索，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会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应运而生。自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拥有文化知识，有条件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有较强的思辨能力，这决定了他们比较敏锐，对社会的时弊往往他们最先觉察，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往往最为关切。因此，他们身上的忧患意识和励精图治的观念也往往格外深刻。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灾难的祖国，利用自身的优势，想通过教育救国的方式，来救国救民。

地方阶级改革派的代表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

鸦片战争的结果，加强了社会危机。残酷的现实，使比较开明的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加不满，对封建制度产生了某些疑虑，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封建制度，其中一些人要求改变现状。于是，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些主张改革社会、抵抗外侮的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即其重要代表。他们是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近代放眼世界的第一批有识之士。他们提出了内修政治、富国强兵、外御强敌，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进步主张，并抨击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反对空疏无实的“理学”，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批评八股取士制度，要求广开言路，选拔兴邦治国的实用人才。这都对以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清末盛行的空谈心性专事考据的传统封建教育造成了“士不知耻，百官无能”的局面，因而要求改变这种教育。龚自珍明确指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儒学不应该再成为唯一独尊的思想，教育也不应再以儒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而应该学习“经世致用”的新知识。魏源更明确地指出，空疏无用的“理学”，“上不足致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是毫无价值的。他特别指责当时偏重训诂、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学术研究应从当今实际出发。在魏源看来，鸦片战争所以失败，关键在于内政不修，而内政不修的根由则在于缺乏经邦治国的人才。他认为“人才进则军政修”。所以，应该选拔和任用有实学能治国的人才。他说：“官无不才，则国为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他理想的人才，必须革虚就实，能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实”。也就是说，无论在军事、外交、理财、实业各方面，都要有实际的知识 and 技能。因此，他要求改变当时官场和知识界的“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的弊病。

在抨击传统教育的同时，他们也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学制度。龚自珍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同，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访问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所选取的人，多是一些对于治国安邦大事一窍不通，一旦国难临头，会像鸱、燕一样飞逃。然而，一旦混入官场，却又一味追求享受，作威作福。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实为“摧锄天下人才”。龚自珍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下所出现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日之将夕”，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并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地方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不仅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研究世界的形势和“四学”，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封建传统教育。林则徐在同侵略者斗争中，深深体会到资本主义列强科学技术发达和军事技术先进。他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去战胜他们，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了解敌情，他在广州设立翻译馆，翻译外国书籍

和报纸，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买新闻报纸”。他把翻译的有关西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材料，编成《四洲志》草稿。这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方情况最早的一部著作。

魏源主张向西方学习，讽刺那些盲目排外、目光短浅的保守主义者为井底之蛙，“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他驳斥称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意义。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自悉情始。”又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他编写《海国图志》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开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他们企图通过科学文化教育来挽救“日之将夕”的清王朝。但是，尽管他们思想中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就整体来说，还是封建主义的。然而，也应该看到：他们要求改革封建弊政，建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尝试、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愿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改造传统教育的主张，都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教育救国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激起了人民群众走上反抗的道路。鸦片战争后 10 年左右的时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并定都南京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随后，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教育方面，确定了新的方针政策，改革了教育内容，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把教育作为推动革命，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

天京事变后，洪仁玕总理朝政，他向洪秀全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建议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制度和政策，把中国建议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方面他提出了几方面的设想：

第一，《资政新篇》提出，改革内政首先应该注意对人的教育，即改变人的思想面貌和道德行为。他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指出“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帮欺”，反对“结党联盟”，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要求领导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以改变当时存在的“骄奢之习”，就是用新的道德观念来教育人民，规范人民的行动，改造人的精神面貌。

第二，《资政新篇》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改变当时“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落后的教育状况。主张用“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近代科学成就，去“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以个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企图把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引进学校。

第三，《资政新篇》提出，建立新的教育机构，改革旧教育制度，提出“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主张，反对封建贵族式的“古典之言”，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奖励人民开设“学馆”，以教育青年一代；设“士民公会”，以兴办教育；建立“跛盲聋哑院”，“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办“鳏寡孤独院”，“生则教以诗书各法，

死则怜而葬之。”并且主张“凡外国人技艺精巧”者，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条件下，准许传授科学知识，“教导我民”。1860年容闳（1828~1912年）向洪仁玕建议：一、建立武备学校；二、建设海军学校；三、颁定各级学校制度；四、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深得洪仁玕的赞赏。

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不仅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有关政策。他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主张，对后人具有启迪的作用。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后期是企图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业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但是由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尚未形成，客观上缺乏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再加上戎马倥偬，没有力量致力教育建设，所以，许多主张没有实行。

洋务运动的教育革命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中国处于强敌环伺，民族危亡的危险局面。中国紧紧关闭的封建大门已经洞开。所谓“华夷混一局势已成”，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官僚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被迫认真对待中国胜败存亡的问题。以曾国藩（1811~1872年）、李鸿章（1823~1901年）、左宗棠（1812~1885年）、张之洞（1837~1909年）等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为了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提倡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活动，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某些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枝节性的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这种活动史称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教育活动是重要方面。洋务派主张兴“西学”，提倡“新教育”，以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认为，当时“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所恃。”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他们提出，一、变通“考试功令”。李鸿章说：“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养人才之道。”二、设立“洋学局”，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他们认为，“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所以应该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他们本着“变器不通道”的原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提倡“西学”学习西人所擅长的“测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以及“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而且认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所以仿照西方学校在上海、天津等相继办起了新式学校。洋务派的“新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创建新型学校

洋务派建立的新型学校有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所受损失极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急需培养中国的翻译人员。这是清政府决定建立外国语学校的主要原因。外语教育当时叫方言教育。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看到，中国的军备武装远不及西方先进，他们主张：“师其所长，夺其所恃”，改变那种“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的懦夫思想。他们所

说的“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就是购买和制造轮船、枪炮，从而建立制造军火的兵工厂，如上海机器制造厂，福建马尾造船厂。为了培养技术人员，在工厂里附设了工业技术学校。洋务派认为，要想“靖内患，御外侮，非讲求兵制不可”，“整顿陆营则内患不作，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从这里可以看出，洋务派军事教育的目的，既有“靖内患”镇压人民革命的一面，也有“御外寇”，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是“攘内”有功，“制夷”无力。

上述各类新型学校的建立，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先声，为中国以后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初步基础，也是有一定影响和历史意义的。

第二、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洋务派“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要熟悉西方情况，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只在国内办学还不够，需要到外国去耳闻目见。曾国藩、李鸿章于同治十一年上书清廷，奏请派“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的聪颖子弟去美国留学。按照他们的计划，自1872年至1875年每年派30名幼童出国，4年共120名，15年后逐年回国。学习的科目主要是军政、船政、步操、制造。我国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这一批留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中国近代派留学生的开始。

1881年，留美学生监督吴子登以学生沾染洋气，“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将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理由，几乎将全部学生召回，留下继续学习的仅10人而已。

光绪二年沈葆楨、李鸿章又请求派学生到欧洲留学。他们在《闽广学生出洋学习析》中提出：“清于闽广前后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按照规划派30名学生出国，去法国学造船，去英国学驾驶，学习3年，期满回国任用。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办洋力的人才，用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出乎封建统治者的意料，除出现少数洋奴外，大多数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洋务派的“新教育”自同文馆建立以来，虽然创办了一些新型学校，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校系统，所有学校也都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形式，只能称作“新教育”的萌芽。虽有影响，但成效不大。

洋务派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特权，培养洋务人才。本质上是封建性的，并带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烙印，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然而，从整个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来看，洋务派的教育改革，在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一次建立了新型学校，第一次将“西学”付诸教育实践，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科学技术人才，这些都起过积极作用，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中国近代教育中，“中学”与“西学”的问题，自鸦片战争开始就提出来了，而且贯穿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派别对“西学”的理解、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目的各不相同罢了。

洋务派认为，凡一切封建主义的典章制度、伦理思想，都属于“中学”的范畴，凡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西文”、“西艺”，即为“西学”。

正如严复所指出的，洋务派只知道“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洋务派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教育的纲领和指导思想。

张之洞（1837~1909年），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阐述者。自中法战争以后，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他办了许多洋务事业，既办枪炮厂、铁政局，又办布厂、纱厂、丝厂，而且也办了许多“洋学堂”。1907年至1909年在中央任职兼管学部，主持全国教育工作。清末的教育改革，特别是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是在他直接参加下完成的，对清末教育有一定影响。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系统地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认为，当时新派提倡“西学”反对“中学”，旧派反对“西学”只要“中学”，两者都有片面性。“旧者因噎废食，新者歧多而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度之本；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在他看来，只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不偏不倚的正确思想。这里所说的“旧者”是指封建顽固派，“新者”是指资产阶级改良派。张之洞以为，应该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事事”。若如此，既可改变旧者的“不知通”，又可以纠正新者的“不知本”。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育上影响很大。洋务派所谓的“中学为体”就是以封建伦理思想、中国的经史之学作为一切学问的根本。所以，学生应该首先从经史子集中学到“圣人之心”，“圣人之行”。然后，才可以学习对于封建统治有用的“西学”。张之洞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识我中国历史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他认为，假如只讲“西学”，“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在为体的“中学”里他特别强调“明纲”，即以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去教育学生和人民，把“明纲”看作是“五伦之要五行之源”，甚至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因此，他主张把“忠孝”作为各级学校立学的根本，并且以“夫妻之纲”反对维新派提倡的男女平等的教育思想，说“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以“君臣之纲”，反对维新运动要求的有限民权，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甚至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由此可见，洋务派的“中学为体”的本质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

洋务派的“西学为用”就是在尊孔读经坚守礼教、维护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教学一点西方的语言文字、法制规章和为半殖民地工业服务的自然科学知识。张之洞把这些归纳为“西艺”和“西政”，其条目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他们的“西学”不包括那些动摇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政治学说。

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混合体。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需要，为在中国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是，也应该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

初始阶段，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主张“西学为用”，强调向西方学习，承认“西学”的“用”，就是对顽固派仇视新事物的一个否定，而“用”的推行也不可能不触动万古不变的“体”。所以，最初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提倡和维护“西学”方面看，打开了向西方学习为门户，实行教育的初步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可是到了维新派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改变君主专制体制时，洋务派这个口号就具有抵抗维新运动的反动作用了。

维新派的教育革命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从官僚、地主和商人中转化出民族资产阶级，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言义者。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开始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

维新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所以，他们把“设学校以培养人才，立报馆以宣传变法，建学会以组织力量，译西书以介绍西学”，当作救亡之道。

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受侮数十年”就是由于上下不通，内外隔绝，而“去塞求通”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设报馆。梁启超说：“阅报者愈多，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通过报纸的宣传，就能够使“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康有为为了以维新思想去影响王公大臣，于1895年7月，自己出资创办《中外纪闻报》，这是维新运动最早的报纸。此外，他们还创办了《国闻报》、《湘学报》、《知新报》、《求是报》等等，这些报刊在传播新思想，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维新运动领导人把建学会作为组织人力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欧美各国所以能称雄于世，就是由于“群心”。梁启超说：“道莫善于群”，“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他要求全国各地广立学会，这样才能有实现“雪仇耻”、“修庶政”的可能。在康、梁的影响下，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随后，“上海强学会”、“北京保国会”相继成立。康有为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力陈中国被列强欺凌，濒于瓜分的危机，号召人们奋起救亡，大声疾呼：“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接着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学会，成为维新运动的政治团体，对变法救亡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办学堂、开民智，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内容。维新派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培养维新人才。他们认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订，在变科举”。维新派指出，科举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培养一些空谈性命、玩弄词章、抱残守缺、无裨实际，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腐儒”和“学究”。他们痛切指出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他们认为“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改革旧教育，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遵通通古今，知时务，学以致用原则

来培养人才。并强调：“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所以，在维新运动中，办了一些学校，其中最有名的为“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1895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有51处，其中学会24处，学堂19所，报社8所。这些学会、学堂、报馆，在介绍西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唤起人们起来改革社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出现了举国士民“家务言时务，人人读西学”的情景，使人们开始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维新变法运动进行了思想准备和领导骨干准备。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活动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和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发挥教育的作用。他们把学校作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阵地，培养及清起义骨干的场所，有些学校实际上成为反清的革命据点。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开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觉悟

当时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感受到国家危亡的严重形势，他们热爱祖国，立志报国，很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从1901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和国内出版了大批书报杂志，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冯自由的《辛亥前海内外革命报一览》列举了报刊67种，杂志49种。影响最大的有：《民报》、《苏报》、《国民报》、《民呼报》、《中国女报》、《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游学译编》等，报刊杂志的出版和发行，对批判封建意识，传播民主思想，起过重大作用，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二）创建学校，培养革命骨干

培养有用人才，挽救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呼声，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说：“中国此时尚不广兴学堂，真是无从救了。”革命派要求建立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新型学校，以新的时代精神武装年轻一代，以培养敢于“宣战君主”“内修战事、外御强邻”的“革命健儿”和“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

这个时期，革命派积极创办了许多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和大通师范学堂等。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谈到了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的活动情况。他说，爱国女校对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年长而根底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力量，“辛亥革命时，本校学生多有从事于南京之役者。”

爱国学社等校的革命活动，使清政府惶恐不安。清政府采取残酷的手段对爱国学社等校的师生进行镇压，并强行解散了爱国学社，但是反动当局的镇压，并不能阻挡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各地兴办革命教育之风方兴未艾，盛极一时。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前后进行了多方面的教育改革，但是，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教育改革，有过许多人力图教育救国而不懈的求索。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不论地方阶级改革派的教育救国，还是太平

天国的教育救国，不论是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还是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救国，都没有为苦难落后的中国找到出路，却越来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各种“教育救国论”都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登台亮相，同时也在这里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和选择。大浪淘沙，许多西方资产阶级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革，在中国失灵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改良主义者的教育改革也遭到无情的抛弃。教育救国在中国近代史上试验了，但行不通。中国革命必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出路。

革命救国的壮举

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但帝国主义并未放松对中国的侵略。《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工矿交通，垄断了中国的财政金融。而卖国的清政府却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度与宽容，一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同时也日益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苛捐杂税又多又重，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新的民族危机面前，要革命，要改变现状，要谋求发展，要实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号者，便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亦称革命派）。

他们有软弱的地方，也有糊涂的时候，但是他们决然奋起了。是“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爱国热情，是危难之中艰苦而顽强的斗争，造就了他们这一批慷慨悲歌的爱国英雄们。他们雄心勃勃，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的、进步的政府”；他们组织起义，奔赴战场，英勇献身，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历经一次次失败的磨难，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竟很快落到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实现“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社会”的宏愿。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们也胜利了，革命救国的壮举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以后，在他们洒下鲜血的这片国土上，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集团，都不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他们的功勋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革命救国思想的传播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是社会政治形势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救民于水火，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使他们毅然走了上革命救国的道路。《辛丑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1902年以后，《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相继签订，进一步便利了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掠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民穷财尽，而且严重压抑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夺取了中国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还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大权。帝国主义者争相抢占势力范围，即使边远省份也在他们争夺之中。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和外债，解决财政危机，推行“新政”，大兴苛捐杂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整个社会处在激烈动荡之中。继义和团运动之后，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清政府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而讨好帝国主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列强的卵翼下，维持反动统治。清政府真正成了“洋人的朝廷”，这时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这种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充分表现出了他们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理论，有着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特点。他们的爱国不再和忠君联系在一起，也不再是忠于某一个封建的朝廷而寄希望于它。他

们认为，爱国必须革命，必须走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道路，建立崭新的中华共和国，他们把爱国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统一起来了。他们就是这样带着资产阶级改良者所没有的革命理想、革命纲领、革命组织发动了辛亥革命这一救国壮举。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力于这种革命爱国思想的传播。从1900年以后，鼓吹革命的言论开始活跃，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自1903年，革命思潮进入广泛传播阶段，国内知识界和海外留学生，纷纷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短短二、三年内，出版政治性刊物有20多种。如留学生中的《开智录》、《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上海的《大陆》、《童子世界》，陈范接办的《办报》等倾向革命的刊物。拒俄运动后，《国民日报》、《觉民》、《女子世界》又相继问世，同时还有一些宣传革命的书籍，这些书刊大都以宣传爱国思想，揭露清政府腐朽黑暗和号召“排满革命”为中心内容。

在这些书刊里，爱国志士沉痛描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酷掠夺，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对中国的时局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号召人民要发扬爱国精神，“身家不足爱，土地财产不足恤，而惟‘爱国’二字，为国民无上之天职”。爱国志士还指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希望它能够自强图存，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明确宣布：“欲立新国乎？则必自亡旧始。”同时他们摒弃了维新派追求的“明治维新”、“彼得变政的救国模式，转而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中寻求自己的救国理想，认为只有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才是救国之路。

在宣传这些革命思想的革命者中，孙中山可以说是最杰出也是最成熟的代表了。他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联合政府”的革命口号，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才能救中国。他在1904年的《中国问题之解决》中说，要“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的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面对保皇派的进攻，他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反击，在《敬告同乡书》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康有为的《最近政见书》的实质，是要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梁启超说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不过是一种骗术。号召人们要“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在《驳保皇报书》中指出保皇派侈谈的是爱清王朝，而不是“爱国华国”，所以是“非爱国，真害国”。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民主思想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在传播民主爱国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和宣传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便是其杰出代表。

章炳麟在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民智未开”，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只在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独立和自存。

邹容在1903年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名篇《革命军》，他以满腔热情讴歌革命，指出：中国人民要想获得民族的独立和社会进步，必须打倒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的清王朝。《革命军》在知识界影响很大。

陈天华1903年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宣传革命救国的小册子。他满怀爱国热情，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

阐发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他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进行反清革命，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提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他号召人民一致起来，“必须苦苦死战，才能救得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真正成熟，是1905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的三民主义，这是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的概括。民主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把中国变为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为“平均地权”，即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他们的这一纲领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带着强烈的爱国色彩。

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革命思想的过程中，革命派与改良派在1905年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对传播革命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论战主要是围绕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即：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改良派无视清政府对外卖国投降的罪行，竟然宣称“排满”革命是无的放矢，是种族复仇主义。并宣称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不但不能救国，反而会导致亡国。革命派严厉批判了改良派的谬论，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清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民族革命是必要的。他们指出：要爱国，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清王朝，革命才是救国良药。

革命派在论战中虽然有许多弱点，但论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传播了革命救国的新的爱国思想，使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获得日益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革命派通过积极传播革命救国的爱国新思想，不仅为辛亥革命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给这次救国创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

爱国革命组织的建立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大力开展革命宣传的同时，还积极建立革命组织，这些革命组织大都以爱国为宗旨。这些组织一建立就把革命同爱国联系在一起了。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这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爱国革命组织。在其章程中说：“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及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忧虑，斥责了清统治者的误国。明确提出立会的宗旨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创兴是会以民志而扶国宗。”表明了孙中山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

兴中会成立以后，随着知识界中革命思潮的发展，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比较著名的有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

1903年，留日学生在日本组织了一个爱国组织——“拒俄义勇队”，他们除在日本活动外，还积极派人回国进行革命工作，华兴会便是由被派遣回湖南活动的黄兴发起组织的，成立于1904年2月，主要领导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光复会（1904年冬）是由留日学生龚宝铨等推动的，主持中国教

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

科学补习所是 1904 年 7 月由湖北革命人士刘静庵、吕大森等在武汉成立的革命团体，主要在军队中开展工作。1904 年前后，各地还陆续成立其他一些小的革命团体，如上海、福建的学生会，江西的自强会，安徽的武毅会等。

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构成成份很复杂，但领导人和主要成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团体一般规模比较小，处于秘密状态，还没有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活动范围也很有限。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它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促进了小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的发展，他们活动的地区也很快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爱国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党领导这次革命。而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分散活动、力量不够集中，行动无法统一，日益显得不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这时同盟会便应运而生。

1905 年夏天，根据革命形势的要求，孙中山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以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于是在 1905 年 7 月 30 日，孙中山同黄兴、宋教仁等各革命团体负责人，在东京集会，决定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东京，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在国内外许多地方设立支部。

尽管同盟会内部有分歧，思想也复杂，是一个比较分散的联盟，但它的成立还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明确纲领、有组织机构的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力量日渐壮大，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爱国热潮及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爱国武装起义的发动

同盟会成立以后，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理论上区分了新旧爱国主义，而且一开始就把革命救国同武装斗争结合在一起。从兴中会成立后的第二年 10 月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开始，中国资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斗争，直至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在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虽然遭受过无数次的失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们始终坚持革命救国，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起革命组织以后，他们就没有停止过武装起义的组织和发动，把爱国热情付诸行动。这些起义在 1904 年以前主要是兴中会发起的 1895 年的广州起义和 1900 年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以后，武装起义也越来越多，比较著名的有：

1906 年在湘赣两省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爆发的大规模起义。

1907 年 5 月的饶平黄冈起义；6 月惠州七女湖起义；9 月的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 月的镇南关起义。

1908 年 3 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4 月云南河口起义。

1910 年 2 月，广州新军起义。

1911 年 4 月，广州黄花岗起义。

另外还有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于 1907、1908 年发

动的两次起义。

这些武装起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连遭失败，但革命党人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在革命斗争中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的精神却是彪炳史册、永照后世的。

在这些爱国志士之中，孙中山是首次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的，他虽然遭到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但勇赴国难、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信念始终未动摇过。

在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救国的壮举中，爱国志士，为“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矢志不渝地坚持斗争。在一次次失败面前，他们不气馁；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他们不退缩；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他们不屈服，充分表现了他们英勇牺牲、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在这些爱国志士的英雄事迹中，黄花岗起义的勇士们，尤其显得英雄壮烈。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一次起义，是革命党人“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之最后一搏”，是历次起义中准备最充分，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的一次。原想占领广州后，由黄兴、赵声分别率军出湖南、江西，会师于长江，几经波折，起义终于在1911年4月27日发动了。起义总指挥黄兴率领百余健儿，由小东营进攻两广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他们放火烧了督署，转攻督练公所，途中与清兵发生激战。黄兴手足负伤，仍率队且战且退，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才躲入一家商店，忍着剧烈的疼痛，左右射击，消灭防营七八人后，化装出城。在起义中林觉民随黄兴攻督署，挥弹当先，直冲署内，腰部中弹倒地，又纵身跃起，杀敌多人，数处受伤，鲜血淋漓，终于力竭被俘。喻培伦身背一大束炸弹，左手握号筒，右手执枪，容貌威猛，在战斗中，一人当先，抛掷炸弹，敌人为之披靡。奋战一昼夜弹尽粮绝，突围被捕，被俘后仍大义凛然，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喻培伦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李德山就义时豪迈地表示：“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饶辅臣烈士被捕后惨遭酷刑，最后英勇牺牲。事后72具烈士尸体被收葬在黄花岗，因此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其实在这次起义中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远非这些。

在革命救国的壮举中，华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革命捐助了巨额经费，仅黄花岗之役，就募集了18万余元的巨款。许多华侨为革命捐款，不惜倾家荡产。除了邓荫南、李卓铎外，还有华侨资本家林受之倾家捐助，致使子女因而成为佣工；谭德栋“为国而毁家”；肖竹琦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也把他的田产全部售出。更可宝贵的是华侨中干苦力的，尽管生活困难，也倾其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

广大爱国华侨不仅慷慨解囊、资助经费，还有不少人亲临战场，参加武装起义，把鲜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三分之一是爱国华侨。他们有的很早就从事革命工作，如南洋华侨李炳辉，很早加入同盟会，热心宣传革命，他虽身在国外，“而救国之志，未尝一日去诸怀”，在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献身。越南华侨罗联，在黄花岗起义中不幸被捕，临刑前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勿气馁。”

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中华儿女即使身在天涯海角，孤身漂流海外，也念念不忘中华民族这块热土。广大华侨的爱国事迹，便是一种见证。孙中山曾以“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盛赞海外华侨在革命中的功绩。

革命的胜利和最终失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士兵一夜间取得了起义的胜利，为清朝统治敲响了丧钟。

1910年前后，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活动以及资产阶级收回利权的运动，都进一步开展起来，全国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使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看到起义的良机已经到来，都主张由革命力量较充实的武汉方面首先发动起义。这时活跃在湖北新军中有两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组成了统一领导机构，并准备在10月6日起义，后又改为10月11日。10日晚，工程兵第八营的士兵首先发难，打响了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局，随后而起的革命党人纷纷赶到，公推守楚望台的左队队长吴兆麟为总指挥，马上分路向督署进攻，11日上午全部占领武昌，下午成立军政府，12日占领汉口，13日占领汉阳。武汉三镇，全入革命军之手。这次起义是在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孙武等不在的情况下发动的，如果没有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赴后继的斗争，没有革命士兵的爱国热情，是不会有武昌起义的胜利的。

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在10月、11月间，全国22个省有17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了军政府，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形成我国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浪潮。11月，上海人民起义，12月，革命军克复南京，革命重心由武汉移动到长江下游。这时多年奔走革命，在人民心中有很高威望的孙中山先生从美国回到上海，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不久成立了参议院，并在仅有的3个月中，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梦想，因此帝国主义异常惊慌，他们非常仇视中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起义后，他们尽力支持清政府，希图维持其反动统治。但革命迅速发展，他们阻挡不住，便假装“中立”，寻找机会伺机破坏。终于找到了反动军阀袁世凯可以作为新走狗，以代替清政府充当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以及袁世凯的压力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妥协退让。12月南北双方和谈，南方政府同意：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让，自己宣布赞成共和，就可以把政权让他。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5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临时参议院马上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终于实现了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阴谋。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就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来说，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他屡战屡败，旋仆旋起，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而进行的辛亥革命的救国壮举，却充分展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志。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他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次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广泛地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使民主主义

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此，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谁再想复辟，恢复专制制度，都会被群起而攻之。袁世凯、张勋等小丑们不是都被赶下台了吗？虽然辛亥革命建立的政权仅具民主形式，甚至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相差很远，但却不可否认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变化。

其次，辛亥革命不只推翻了一个封建专制政权，而是推翻了一个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政权，因而这一革命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打击。毛泽东同志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政府的命，是因为清朝皇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的清政府一贯奉行“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动政策，这次壮举推翻了清政府统治，自然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也有着积极影响。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革命中，坚持着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建立临时政府后的妥协退让，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对付任何反动势力，不靠武装革命是难以取得真正胜利的。这条经验对后来中国的革命是极为宝贵的。

第四，它还在经济上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4有利因素，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起到了推进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作用。

这次革命救国壮举的伟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一，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要爱国、要救国，不但不应对它抱有任何幻想，还应针锋相对地对它展开斗争。孙中山先生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二，辛亥革命的发动者们，没有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更没有解决农民的切身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缺乏力量，因而救国乏力。孙先生日后也认识到了“必须唤起群众”。

第三，这次革命的失败，还证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要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此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